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身體、權力與認同：中國文化中「身體」的實際與虛構——
近代中國的「文明化歷程」：「野蠻/病態」身體論述與近
代中國國族想像(第3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類別：整合型

計畫編號：NSC 96-2411-H-004-009-MY3

執行期間：98年08月01日至99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楊瑞松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年08月09日

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 ——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 核心的探討

楊瑞松

1903 年日本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開幕前夕，由東京大學人類學家坪井正五郎所策劃的「人類館」，預定將「支那人」和其他如台灣生番等七種人種以活人展出的規劃經新聞披露後，中國留學生憤怒地認定此項展出安排乃是日本人企圖將中國人醜化為野蠻人的計謀，並且斷定坪井要以纏足女性和吸食鴉片者的活人演出，以供世人參觀恥笑中國人的野蠻習俗。在經過留學生的強力抗議和清政府的外交交涉後，有關「支那人」的展出部分在人類館開幕前即被下令中止。此事件不僅引起當時的中國輿論種種評論，並成為日後反纏足運動和民族主義論述的重要歷史記憶。本研究以嚴謹的中日文文本分析入手，重新嚴格檢視留學生關於人類館展出的內容和目的論述，將它們置於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危機意識的脈絡，進而探討這些論述和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的密切關連性。本文認為留學生對人類館的指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稻草人謬誤」的思維基礎上；因此，唯有回到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的脈絡上，才能顯現其真正的複雜歷史文化意義。

關鍵詞：野蠻 人類館 坪井正五郎 纏足 鴉片

一、問題的源起

1903年2月，日本全國上下進入緊鑼密鼓的狀態，熱切地期待預定在3月1日登場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這場博覽會雖多次延期，卻是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博覽會。日本明治政府亟欲藉此展覽會，向國際社會展現其新興的產業實力，進而為日本開拓更多的國際貿易商機。然而，就在最後倒數階段，一則全文不到兩百字且版面位置極不顯眼，但和博覽會相關的新聞報導(先後在2月10日的《日本》和2月11日的《國民新聞》刊出)，卻意外地引發了一連串的抗議事件。首先是中國留學生們發難，他們認為預定在3月10日開幕的「人類館」展出內容，是博覽會主事者要將「支那人」醜化為「野蠻人」的惡意行動。留學生們透過大阪的華商協助和外交管道交涉，要求日本政府中止有關「支那人」的展出。相關的新聞議論，也紛紛出現在中日兩國的報刊上。於是在人類館正式開幕前，「支那人」展出從原始計畫中剔除。¹然而此抗議事件仍然餘波盪漾，人類館開幕後，來自韓國和琉球的類似抗議和議論，又使得人類館的展出內容一再變更。直到5月中，隨著原先參與展出的琉球婦女中止合約返回琉球後，整起風波才漸漸平息。

在日本全國上下萬眾矚目下登場的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並未因為這一場歷時約四個月的事件而失色。為期五個月的展覽期間，約有530萬的國內外來賓參與此盛會(當時大阪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在有關各類展示品的眾多新聞報導討論中，人類館引發的種種風波不過是一段小插曲而已。但是，從長遠的歷史發展角度而言，作為在日本博覽會史上，

¹ 事實上，此館在正式展出時的名稱已變更為「學術人類館」。為了行文方便起見，本文仍沿用其原始名稱。

第一次出現以活人展示來「再現他者」而引發國內外糾紛的大阪人類館事件，無疑具有極重要的研究價值。首先，此項歷史事件提供了有關近代日本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認同(identity)議題研究的素材，特別是有關愛奴人和琉球人作為日本公民和所謂內地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界定。²其次，由於此次「再現他者」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的跨文化/國際糾紛和回應，因此這些來自所謂「他者」的聲音和訴求，特別是來自中國留學生們對此事件的反應所反映出的歷史意義，也已吸引許多學者加以研究討論。³

然而，上述從「他者」面向或視角探討此事件的研究，雖然豐富了我們對此事件的多層次面向的了解，但是也正因為這些研究，尤其是有關中國留學生們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依據留學生們的視角和論述，進而分析此事件的開展和其對留學生們的影響，因而忽視了兩項重要相互關聯的因素：(1)留學生們的論述和抗議是在高度情緒性因素

² 關於此面向的代表性著作，可參閱松田京子，《帝國の視線——博覽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 119-141；金城勇，〈學術人類館事件と沖繩——差別と同化の歴史〉，收入於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大阪：有限会社アットワークス，2005)，頁 27-69。

³ 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側重中國留學生面向探討此事件的研究，僅有以日文寫作的作品，較具代表性研究有：巖安生，〈「人類館」現象と「遊就館」体験〉，《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 99-149；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権觀・博覽会事件〉，《思想》，849(東京，1995.3)，頁 61-84；菅野正，〈大阪博覽会(一九〇三年)と中国〉，《奈良史學》，13(奈良，1995.12)，頁 124-147；北岡正子，〈第五回内地勵業博覽会と清國留学生〉，收入於関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科編，《文化事象としての中国》(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頁 205-234；呂順長，〈大阪人類館事件における中国側の対応について〉，收入於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編，《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頁 112-113。

衝擊下的產物，因而他們對此事件的描述和指控，並不能被視為單純的事實陳述，而必須被重新和其他歷史證據加以比對分析和審視(特別是中日文相關文獻的交叉比對)。一方面，他們的論述和指控可能受限於他們對於整個資訊掌握的完備性(例如他們並不了解人類館是場外餘興機構，並非是由博覽會主辦單位所規劃或主管)；另一方面，他們的一些陳述則明顯出自於他們主觀認知或情緒的投射(例如他們一口咬定此次展出依照坪井正五郎的著作《世界風情寫真帖》)。也正因為如此，留學生們有關人類館的指控言論，包括他們如何「再現」(represent)人類館的展出計畫的說辭，都不應當輕易地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文獻證據，可以用來說明人類館的展出內容和目的；相反地，其論述應該被嚴格地加以檢視和分析比對，進而找出重要線索讓我們探討他們當時的思維邏輯和價值取向。簡言之，留學生們的情緒因素，尤其是本研究所探討的野蠻情結，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必須被仔細地分析探討它們如何影響他們對於人類館的看法，及其本身的價值觀，如此才有助於我們評斷相關歷史文獻的證據性(evidentiality)；(2)關於「支那人」的展示，在人類館開幕前即被中止取消，因此從原先策展者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僅停留在原先企劃書上的「他者再現」，並未付諸實踐，所以嚴格而言，這是一個沒有真正再現的「他者再現」。因此，關於所謂「支那人」展出的「what & how?：是什麼樣的『支那人』？以何種方式展出？」甚至包括「why?：為何要展出支那人？」等根本問題，都留下了許多空白。但也正因為如此，可以說在一個很弔詭的情況下，留學生們和中國輿情對於上述這些問題的認知和論斷，反而填補了上述的空白。他們不僅建構了當時中國方面對此事件的認知，和日後對此事件的公共記憶，甚至主導了現代學者的研究目光。

正式討論上述議題之前，我將先回顧並檢視學界目前對於人類館事件的一些代表性看法，作為本文探討和對話的基礎。首先，在日本

文化研究學界中具舉足輕重地位的吉見俊哉，在其有關博覽會的政治學研究中，即是以此次人類館的展出作為一項有力的佐證，來論述說明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具有光耀當時新興日本帝國主義的祭典性質。更重要的是，吉見俊哉對於此次人類館的展出意義的界定乃是：「它是有和同時期的巴黎萬國博覽會及美國的博覽會將原住民活人展示的設計一樣，都是具有人種差別主義(歧視主義)性質的設置。」⁴吉見的詮釋是具有典範性並持續影響後續有關人類館研究的代表著作。例如松田京子和坂元ひろ子均引用吉見俊哉的看法，作為她們自己定位此事件的立論基礎。⁵

吉見俊哉將大阪人類館視為是其他歐美博覽會類似展出的翻版或複製的見解，主要是建立在關於近代歐美博覽會上活人展示的研究基礎上。誠如相關研究指出，從 1867 年到 1986 年間，在歐美國家為主舉行的博覽會上，有來自 67 個殖民地的原住民以活人展示的方式，作為會場中間休憩區(所謂 the Midway)的餘興表演；同一時期，也有來自 16 個獨立國家的人民，在會場中的各國特展區上，以活人秀展示異國情調。在這些博覽會中的活人展示(尤其是來自殖民地區的原住民展示)的一項主要目的，正是主辦單位想要藉由「再現」這些地區的「野蠻落後」的生活模式，以凸顯出正式展出區的西方文明的進步性和殖民的正當性。⁶由此看來，從表面上的形式而言，吉見將 1903 年大阪人類館的

⁴ 吉見俊哉，《博覽会の政治學》(東京：中公新書，1992)，頁 211-213。

⁵ 參見松田京子，《帝國の視線——博覽会と異文化表象》，頁 138-139；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權觀・博覽会事件〉，頁 77。

⁶ 相關的分析請參閱 Burton Benedict, “Rituals of Representation: Ethnic Stereotype and Colonized Peoples,” in Robert W. Rydell and Nancy E. Gwinn eds., *Fair Representations: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Virtua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8-61; Anne Maxwell, *Colonial*

展出和當時歐美各國博覽會相提並論的論斷，的確具有相當大的說服力。更何況就人類館原先的規劃——由所謂日本「人類學之父」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並兼具「東京人類學會」創始者身份的坪井正五郎教授主持規劃，計畫將其他的亞洲人種以「活人展出」的方式「再現他們」——而言，這項展出幾乎可謂是知識霸權作為帝國主義的一環，展現人種歧視的知識暴力的典型例子。

然而，如果我們能更深一層的探討，則可看出吉見俊哉對大阪人類館展出的界定，卻是建基在相當薄弱的歷史事實研究基礎上。首先，「人類館」經常被誤解為是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展出的一個重要環節；也因為如此，它在許多詮釋者的眼中(包括吉見俊哉)，扮演了超過它原先地位的角色。事實上，人類館展出是由民間團體出資，並由坪井正五郎提供學術上的意見而成的場外餘興設施。場內的博覽會各項展出設置，則是由日本政府的農商務省主持規劃，並協調各政府單位費時多年籌劃而成。⁷相形之下，人類館的展出計畫是遲至 1903 年 1 月間，才在主辦單位自認規劃不周的情況下倉促上路。⁸其次，吉見的論斷是立基於人類館展出的原始計畫書的書面證據上，而非根據此項展出的複雜歷史發展過程。例如說，他所根據的書面報導(出自

Photography & Exhibition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ive' People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an Identitie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3-95.

⁷ 關於人類館由民間團體籌劃的性質之介紹分析，參閱二宮一郎，〈人類館發起人・西田正俊について〉，《人類館——封印された扉》，頁 120-140；關於此次博覽會籌備工作進行的介紹，參閱芳井敬郎，〈第五回内國勸業博のディスプレ〉，收入於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覽会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96)，頁 287-306。

⁸ 有關此計畫倉促成軍的過程說明，見〈雜報〉，《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8：203(1903)，頁 209。

1903年6月10日發行的《風俗畫報》的博覽會等刊)，不僅關於人類館展出的資訊是過時且不確實的(例如在異人種的展示部分，還錯誤地記載著有「支那三名」)，並且完全沒有提及此次展出前和展出中的各種抗議風波。換言之，吉見有關此次人類館「再現他者」展出的論斷，是根據此次展出的計畫藍圖，而非其真正再現的曲折的發展過程。令人遺憾的是，後續的研究仍舊深受吉見的論斷影響，例如松田京子的著作，雖然已關注到展出過程前後的實際曲折歷史，卻依然受限於「帝國主義的知識暴力展現」的解釋框架中。⁹

相對而言，和本研究主題密切相關的坂元ひろ子的論述，雖然也未脫吉見論點的影響，但是她將研究的焦點從所謂的再現者(人類館)轉移至所謂被再現者(支那人／中國留學生)的回應上。其他同樣是將研究焦點放置於中國留學生們反應的研究，例如嚴安生和呂順長的著作，在解釋中國留學生們的激烈反應時，主要是以當時日本和清中國在甲午戰爭後，彼此之間國力消長的局勢下，留學生們在日本時常感到遭受羞辱和嘲弄的生活經驗，來說明留學生們對此事件的憤怒反應。¹⁰相較這種可謂是「同情的理解」的詮釋，坂元的分析焦點則從晚清人種思想取向的脈絡中，進而檢視中國留學生們的回應言論所傳達出的文化訊息。她的主要論點為：深受十九世紀末以來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中國留學生們，在嚴厲批判「人類館」的展示是日本人惡意將「支那人」並列於野蠻人的作法，乃是一種具有強烈歧視性的侮辱性行為

⁹ 松田京子對於當時人類館展出前和展出時的抗議活動及來自各方不同立場的評論，有相當篇幅的介紹分析，但是其主軸論述仍是將此次展出，視為是人類學在當時新興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上，展現對於他國人種歧視的一種知識暴力行為(雖然是風波不斷的不完美實踐)。她的相關詳細論述分析，參閱氏著，《帝國の視線——博覽会と異文化表象》，頁119-141。

¹⁰ 參見嚴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頁110-149；呂順長，〈大阪人類館事件における中国側の対応について〉，頁112-113。

的同時，留學生們自己的言論卻也同時赤裸裸地表達他們對於其他人種的強烈歧視態度。例如，在他們攻擊人類館展出的文告中，他們公然表明「若爪哇、蝦夷、臺灣之生番，世界最卑之人種，與鹿豕相去一間者也」，因而強調「支那人」不屑與這些「近乎禽獸」的野蠻人種爲伍。¹¹

本研究立基於上述關於中國留學生面向的研究成果上，特別是借鏡坂元將中國留學生的論述問題化(problematize)的研究洞見上；但是不同於先前的研究，它們主要是將中國留學生們和中國輿情視為是一種被動的反應，我將論證他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扮演了積極主動的角色，進而左右事件的發展，甚至界定了此事件的歷史意義。這一個弔詭的局面，亦即原先屬於「被再現者」地位的「他者」，反而主導了如何詮釋一個可謂「流產的他者再現」(an abort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的現象，正是本研究所要深入探討的一項重要課題。我將以不同的中日文相關文本的仔細比對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說明解釋中國留學生們和輿情如何主導了此再現過程。再者，在此一弔詭的再現過程中，尤其是中國留學生界和中國輿情，在自認爲被鄙視爲「野蠻人」的情況下，因而表達出各類複雜強烈的情緒反應，與各種企圖和所謂的「野蠻人」來「劃清界線」的議論，不啻反映出晚清時期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barbarian complex)——本身懷有一種強烈鄙夷野蠻人的心態，卻也時時懷疑自己(或是我族的一部分人)已成爲他人眼中的野蠻人的心理恐慌，同時也認可野蠻人即將被文明人征服消滅的「自然法則」。

在本研究中，我將會探討這個由大阪人類館引發的野蠻情結，如

¹¹ 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權觀・博覽会事件〉，頁 78-79。

何呈現在有關人種意識、族群身份認同、身體恥感、集體記憶、滿漢衝突等議題的論述上。在第二節第一部分的分析討論中，我的研究焦點集中於有關留學生們對此事件的反應，仔細分析他們如何詮釋人類館的展出，並且在他們的詮釋和反應過程中，如何投射他們自己主觀的想法而斷定人類館是「野蠻人展」；第二部分則針對「纏足女／鴉片男」和「滿洲人」如何成為留學生們／中國媒體所建構想像的「野蠻中國人」。第三節的分析特別針對過往的研究所忽視的文獻證據，例如坪井正五郎所著的《世界風俗寫真帖》，探討留學生們為何會認定「纏足女、鴉片男」是坪井正五郎規劃展出「野蠻支那人」的主角；並從而探討坪井正五郎的學術思想和人類館的關係。結論部分則將檢討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和其歷史作用，並重新探討人類館事件的歷史意義。

二、一個歷史事件的形成

(一)引爆點——野蠻人登場

留學生雜誌《浙江潮》第二期(1903年3月2日)的「留學界記事」欄中，翻譯了如下的新聞報導，並將之轉載刊登。

《日本》新聞 1903年2月10日 「博覽會彙報」
關於人類(原文這樣寫，應該是人類館才對)的設立，……經過坪井博士的協助，聽說目前已經與七種人類進行僱入契約中。
這篇報導成為日後一連串事件的開端。¹²

¹² 嚴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頁99。原文如下：

留学生誌『浙江潮』第二期(1903年3月3日)の「留學界記事」欄に，次のような新聞記事が訳出、転載されている。

上述引文是嚴安生對人類館事件研究的文章開端。在指出《浙江潮》第2期翻譯轉載了此處所引述之《日本》新聞的一則報導後，他就忽略了《浙江潮》中的中譯版本，而直接採用引述《日本》新聞報導的原文，以進行對整件人類館事件的後續分析。¹³嚴安生的分析手法，有兩點需要補充說明的地方：(1)此處所提到的新聞報導中譯本，並非是一篇獨立刊行的日文新聞的翻譯報導，而是一篇題為〈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文章的附錄，同時還有另外一篇附錄則是2月11日《國民新聞》相關報導的中譯本；這兩篇中譯本的新聞是以新聞報導翻譯的性質，用來作為支持該篇文章論點的「事實根據」。而〈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這篇文章是由當時的留日學生組織「清國留學生會館」，在得知有關人類館新聞後，集議起草的文告。換言之，〈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和作為附錄的兩則中譯本新聞報導，兩者事實上共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文本，最早一起刊行於1903年2月27日發行之《湖北學生界》。¹⁴(2)其他學者在引用《日本》新聞

『日本』新聞 二月十日 「博覽會彙報」

人類(ママ)設立について、……坪井博士の協賛を経て刻下既に七種の人類雇入契約中なりと云ふ。これから見る事件の，発端になる記事であった。(其中引述之新聞報導全文見註17)

¹³ 文章最開頭的「人類」兩個字之後，應有「館」字，這在原始新聞中即已漏印。

¹⁴ 〈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湖北學生界》，2(東京，190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發行，1983影印)，頁0292-0295。在3月18日發行之第2期《浙江潮》中，除了將這兩則新聞譯文，從全文結尾處移至全文的開頭外，《國民新聞》的中譯本中行文的「演固有特性及生息之雇度階，並其惡風蠻習等，以供觀覽其演技」，轉為「演固有特性及生息之程度階級，以供觀覽其演技」，除去「惡風蠻習」等字眼，但在《日本》新聞的譯文中，仍然保留「並其惡風蠻習等」字眼。見〈留學界記事〉，《浙江潮》，2(東京，190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發行，1983)，頁133。

有關人類館的報導時，也都如同嚴安生一般，直接引用日文原文的新聞報導來進行他們的分析討論。¹⁵這極有可能是因為目前有關此事件的主要研究討論，均是以日文寫作的研究，所以如此作法自然有其行文上的方便性。但是此一方便性的代價，則是所有的學者，都忽略了刊行在《浙江潮》(或《湖北學生界》)的中譯版本，和日文的原始版本兩者之間事實上存有重大的出入。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也都忽略了另一篇《國民新聞》的中譯本，和日文原始報導之間的重大差異，而這些差異出入正是對整起人類館事件(有關中國反應的部分)加以探討的關鍵線索。以下我將用最早刊行在《湖北學生界》中，附錄在〈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的兩則中譯新聞報導，一字不動地(除了加上標點符號外，但保留原來打字上的錯誤，例如 2 月 10 月應該是 2 月 10 日)，來和它們的出處日文原始新聞報導作比對：

陽曆二月十月 《日本》新聞 博覽彙報

有西田正俊氏等就本館正門外百五十坪之地設人類館，雇北海道蝦夷、臺灣之生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七種人，於館內演其固有特性及生息之程度階級，並其惡風蠻習等，以供觀覽，業經坪井博士協贊，刻下已雇定以上七種人云云。¹⁶

1903 年 2 月 10 日 《日本》新聞 「博覽會彙報」

關於人類(原文這樣寫，應該是人類館才對)的設立，作為博覽會的餘興，有志者西田正俊等數名人士，在本館正門外的百五十坪土地上設立人類館。最近，聘僱異人類的北海道愛奴、臺灣的生

¹⁵ 例如呂順長，〈大阪人類館事件における中国側の対応について〉，頁 100；北岡正子，〈第五回内地勸業博覽会と清国留学生〉，頁 208-209。

¹⁶ 〈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頁 0295。

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七種土人，以展示其特別且固有生活的階段程度的人情風俗等等為目的，想令他們的家居模型、民族衣服、器具、動作及遊藝等供人觀覽，經過坪井博士的協助，聽說目前已經與七種人類進行僱入契約中。¹⁷

陽二月十一日 《國民新聞》

有西田正俊氏發起設立人類館於會場正門外，約占地三百五十坪，雇蝦夷、臺灣生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七種人於館內，演固有特性及生息之雇度階，並其惡風蠻習等，以供觀覽。其演技、次第悉照坪井博士調查《世界風俗寫真帖》辦法云云。¹⁸

1903年2月11日 《國民日報》 「大阪博覽會準備彙報」
由於西田正俊氏的發起，在正門前設置的人類館，建坪共三百五十坪，在坪井博士調查之下，僱用愛奴、臺灣生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瓜哇爪哇等的土人，以展示生活的階段程度、人情風俗等為目的，從3月1日開始讓大家觀覽。另外，應該由臺灣慣習研究會出品的土人塑像十具，在大槻如電氏的監督之下，由人形師安木龜八來製作。20日左右會完成。¹⁹

¹⁷ 〈博覽會彙報〉，《日本》新聞，1903年2月10日。原文如下：「人類設立について、博覽会の余興として有志者西田正俊氏外數名本館正門外に百五十坪の地をトして人類館を設立し、最近地の異人類たる北海道アイヌ、臺灣の生蕃、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の七種の土人を傭聘し、其最も特性固有なる生息の階級程度人情風俗等を示す事を目的とし、各居住の模型、装束、器具、動作、遊芸等を観覽に供せんと欲し坪井博士の協贊を経て刻下既に七種の人類雇入契約中なりと云ふ。」

¹⁸ 〈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頁0295。

¹⁹ 〈大阪博覽會準備彙報〉，《國民新聞》，1903年2月11日。原文如下：「又西田正俊氏の發起にて正門前に設置する人類館は建坪三百五十

如果我們仔細比對上述這兩則新聞報導的中日文版本，則不難發現有兩個重大明顯出入：(1)日文原文中的有關「人情風俗、各居住の模型、裝束、器具、動作、遊芸」等可謂是中性字眼的陳述，在兩則中文的譯文中，都僅濃縮成爲「惡風蠻習」四個字眼。純粹就翻譯的手法而言，令人不解的是，翻譯者大可以逐字直譯這篇短短不到兩百個字數的日文原文，卻爲何突然在文章間，以明顯負面的字眼(惡風蠻習)來意譯有關人情風俗等方面的陳述？(2)兩則日文報導都說明此次展覽是得到坪井博士的研究協助，但是在《國民新聞》的中譯本的最後一句話(其演技、次第悉照坪井博士調查世界風俗寫真帖辦法云云)，卻出現了日文原始報導中完全沒有提到的一本著作——《世界風俗寫真帖》。這是一本由坪井正五郎在 1901 年和他人合作編著所出版的作品，但是卻意外地出現在這則中譯新聞稿上。²⁰

我們要如何看待和解釋上述兩項翻譯上明顯的出入和「加工加料」的情形呢？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無論是《日本》新聞、和在次日(2月 11 日)刊登同一則新聞的《國民新聞》，或是其他可能消息來源，包含最早揭露此項人類館展出計畫的《臺灣日日新報》相關報導(1903 年 2 月 3 日)，²¹和主辦單位在 1 月間所商定的《趣意書》，都沒有任何

坪、坪井博士調査の下にアイヌ、臺灣生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の土人を傭ひ生息の階級程度、人情風俗を示すを目的とし三月一日より観覽せしむる由尚臺灣慣習研究會より出品すべき土人塑像十體は大槻如電氏監督の下に人形師安木龜八が製作中にて二十日頃には出来する由。」

²⁰ 此書的英文名稱為 *Ethnographical Album of the World*。它的部分內容和本文的分析主題有密切關係，我將會在文後仔細分析。其出版資訊為坪井正五郎、沼田賴輔編，《世界風俗寫真帖》第 1 集(東京：東洋社，1901)。

²¹ 《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2 月 3 日。此條新聞也出現在 2 月 4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上，原文如下：「大阪西區本田三番町西田正俊氏等，擬於今回博覽會正門前設置人類館，將集北海道土番本島生番，及朝鮮支

字眼或敘述足以成為「惡習蠻風」用語的來源。²²

那琉球印度布哇七種族之男女老幼若干名。特備居住模型並裝束器具以俾詳覽土人生活狀態計畫，先加詳細計畫書稟報其旨於協贊會焉。」

²² 此《意趣書》之後正式刊於 1903 年 2 月 20 日發行之《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 203 號，頁 209。原文如下：「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の余興として各國異種の人類を招聘聚集して其生息の、階級、程度、人情、風俗、等各固有の状態を示すは人類生息に付學術上、商業上、工業上の参考に於て最も有要なるものにして博覽會に缺く可らざる設備なる可し然して文明各國の博覽會を觀察するに人類館の設備あらざるはなし之れ至當の事と信ず然るに今回の博覽會は万博博覽會之準備會とも称す可き我未曾有の博覽會なるにも拘らず公私共に人類館の設備を欠くは我輩等の甚た遺憾とする所なり爰に於て有志の者相謀り内地に最近の異種人即ち北海道アイヌ、臺灣の生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の七種の土人を傭聘し其の最も固有なる生息の階級、程度、人情、風俗、等を示すことを目的とし各國の異なる住居所の模型、装束、器具、動作、遊藝、人類、等を觀覽せしむる所以なり 明治 36 年 1 月 14 日(1903 年 1 月 14 日)」；中譯文：「作為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餘興，招聘各國異種人類而展示其生活的階級、程度、人情、風俗等等各個固有狀態，因為是人類的生活，所以學術上、商業上、工業上是最適於參考的，在博覽會上是不可缺少的設備。觀察文明各國的博覽會，沒有一個博覽會是沒有人類館設備的，因此可以相信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次的博覽會可以說是萬國博覽會的準備會，儘管這是我國未曾有的博覽會，但於公於私缺乏人類館的設備可以說會成為我們的遺憾。因此，在有志之士的相謀之下，將最近的異種人即北海道愛奴、臺灣生番、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七種土人聘僱到內地，以展示他們固有生活的階級、程度、人情、風俗等等為目的，令大眾觀覽各國相異的住居模型、裝扮、器具、動作、遊藝及人類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意趣書》和上述《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均出現的「土人」字眼，在此時期並不意味和文明人相對的野蠻人或未開人。它的意涵近似「土生土長之人」或是現代語彙中的「原住民」。人類館入場優待卷上的英譯的人類館名稱即是“The Worlds(sic) Natives Building”。見此優待卷的影本於大阪人權博物館編，《博覽會——文明化から植民地化へ》(大阪：大阪人權博物館，2000)，頁 8。有關「土人」字眼意涵在近代日本語境中的演變歷史，參見中村淳，〈〈土人論〉—

而在 1903 年 2 月 11 日出刊的《新民叢報》的雜評中，有一篇〈日人侮我太甚〉副標為(敬告東京學生)的文章，有如下的陳述：

日人於今年三月在大阪開博覽會。蓋此邦空前之大會也。其中有所謂「人類學會」之出品。乃將地球上各野蠻人種。各雇一人。置會場中。以備觀覽云。此事各國博覽會所常有也。乃日人竟擬於其中置一中國人。摭拾我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以代表我全國。嗚呼。其侮辱我實甚矣。……日人以野蠻之名加我。不足責也。顧我遂甘受此野蠻之徽號乎。²³

這篇評論並未表明它有關人類館的消息來源，由於它刊出的時間是在 2 月 11 日，和上述《日本》新聞(2 月 10 日)或是《國民新聞》(2 月 11 日)的時間上幾乎同步，因此它的消息來源有可能是 2 月 3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或是 1 月 14 日制定的《人類館開設趣意書》。無論其消息來源為何，評論者很清楚地定位此事件為：日本人想透過此次人類館的設計展出，不僅特意要將中國人和野蠻人為伍，並且「摭拾我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以代表我全國」，目的無非就是要藉博覽會時機，公然醜化羞辱全體中國人於世人之前。

由於此評論文刊出時間和《日本》新聞和《國民新聞》的相關報導幾乎同步，就時間邏輯上而言，翻譯《日本》新聞報導的人和其他留意此條新聞的中國留學生，是有可能同時閱讀到此評論文，並在受其思維影響後，以其觀點來了解看待人類館展出的意義(尤其是有關中國人的部分)；而也因為如此，進而將其所談論的「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的負面評論，來定位所謂「人情風俗」的展出，必定是「惡

「土人」イメージの形成と展開》，收入於篠原徹編，《近代日本の他者像と自画像》(東京：柏書房株式会社，2001)，頁 85-128。

²³ 〈日人侮我太甚〉，《新民叢報》(橫濱)，第 25 號，1903 年 2 月 11 日，頁 81。

「習蠻習」。但是即使這個情況並沒有真正存在，也就是說「清國留學生會館」的組織成員在翻譯《日本》新聞和撰寫〈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時，並未受到其他刊物文本的影響，而主要基於他們自己解讀《日本》新聞和《國民新聞》的兩則相關報導，²⁴《新民叢報》這篇評論的作者和「清國留學生會館」的組織成員，兩者對於人類館的看法和論述的手法，也可謂是異曲同工且不謀而合。

事實上，作為附錄的新聞中譯本和〈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一文，彼此可謂是相互參酌相輔相成。所以要真正了解中譯本新聞報導的翻譯問題，我們必須了解〈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的基本想法。在這篇充滿高度情緒性字眼的文告中，作者除了透露假若支那人安於受辱，則終將淪於禽獸之流的憤怒情緒外，並明確表述為何痛恨人類館展出的理由：

大阪之博覽會，日本之盛舉也。各國冠裳雲集，以攻察其工藝
商業之盛衰進退。有講人種學者，設人類館於博覽會之門，豢
畜支那、朝鮮、琉球、印度、蝦夷、臺灣生番、爪哇等七種之
民於其間。而演其頑風惡習，以為會眾觀覽。嗚呼甚哉此舉也。
吾不知日本人何心也。若印度琉球已亡之國而英日之奴隸也，
若朝鮮俄日之保護國而吾之舊藩屬也，若爪哇、蝦夷、臺灣之
生番，世界最卑之人種，與鹿豕相去一間者也。吾支那人雖賤，
何至與此六種人駢首並足耶！且印度、臺灣、蝦夷，何一非亞

²⁴ 誠如前述，兩篇中譯新聞報導和〈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的文本，最初刊行於2月27日發行之《湖北學生界》，當它們再度刊載在《浙江潮》第2期時，有夾雜幾段補充說明。其中一段提到最初學生閱讀到日本報紙有關人類館新聞報導後的反應：「當時學生既得此報，會館幹事即召集議起草一文，報告各處。」(頁133)如果所言不假，那麼《新民叢報》的評論文，可能尚未引起他們的注意。

洲之土產物，又何苦陳此醜穢之狀態以供泰西各國之一笑耶。……吾國之地圖猶未換顏色。吾國之上下猶未稱臣妾。然而與印度列，比奴隸我也；與朝鮮列，是廝養我也；與爪哇蝦夷列，是明明生番我而野蠻我也。抑吾觀日本各處遍設動物水產各館。今又有人類館之設。是又明明以動物目我水族目我也。²⁵

從上述的論述中，例如「爪哇、蝦夷、臺灣之生番，世界最卑之人種，與鹿豕相去一間者也」、「印度、臺灣、蝦夷，何一非亞洲之土產物，又何苦陳此醜穢之狀態以供泰西各國之一笑耶」的立論，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該文作者對於人種尊卑的明確看法。在這樣的人種觀前提下，人類館將「支那人」和上述三種人並列展出的構思，就「很自然地」被作者論斷為是「與爪哇、蝦夷列，是明明生番我而野蠻我也」的蓄意性羞辱行為。依循此種思維邏輯，作者以「頑風惡習」四字來概括形容其已認定是「野蠻人大集合」的各類生活經驗，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而這樣的思維邏輯，也正足以合理地解釋，為何作為附錄的新聞報導中譯本會以「惡習蠻風」四字來概括翻譯「人情風俗」等陳述。再者，既然「爪哇、蝦夷、臺灣之生番」這些作者所謂「世界最卑之人種」(也就是作者眼中的野蠻人)，已經被認定是其他人種的指標性代表——任何人與他們為伍，就自然會被視為是野蠻人。

此外，從翻譯《國民新聞》的中文譯文中，意外出現的坪井正五郎所編著的《世界風俗寫真帖》，正是另外一條重大的線索，能夠讓我們理解這些留學生們為何如此看待人類館的展出意義。雖然上述有關人類館旨趣的報導(包含《新民叢報》上的評論)，都沒有提到坪井正五郎有關人類館展出的詳細規劃，更沒有隻字半語提到《世界風俗寫真

²⁵ 〈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頁 0293-0294。

帖》，但是留學生們顯然從他們得自《世界風俗寫真帖》一書中的資訊，斷定它就是人類館的設計藍圖，尤其是有關「支那人」部分展出的內容和性質(關於此點，我在本文中的第四節中有詳細的討論)。

因此從上述的分析可見，從翻譯文本應忠實反映原始文本的意涵的最基本原則而言，這兩篇附錄在〈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的所謂新聞中譯本，可謂是相當不合格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語意上的扭曲和翻譯者任意添加的內容。但反諷的是，不管是「惡風蠻習」字眼或是《世界風俗寫真帖》，這些原本都不應該出現的翻譯上之謬誤，卻正是重要的歷史線索，隱含了重要的訊息足以讓我們從而探討追究，留學生們是基於哪些既定的認知框架和詮釋觀點，來理解和定位人類館的性質和可能的展出內容。

當有關人類館展出的消息在 1903 年 2 月間經由日本媒體披露後，無論是來自「清國留學生會館」成員為主的反應，或是《新民叢報》所刊的評論，對此次展出計畫的理解詮釋幾乎口徑一致——這是日本刻意要羞辱中國人的計謀，而其卑劣的手法即是將中國人和其他低賤野蠻的人種並列展出，並且要以若干中國人公然展示其「惡習蠻風」(或是所謂「一二舊習、腐敗之態」)，以野蠻人之姿供天下人觀賞恥笑。這種「日本人蓄意將中國人列於野蠻人之流」的陰謀論，為日後中文的相關論述定了調。後續的發展和媒體的評論，可說是在此基礎上，將此一詮釋產生不同的「變奏」。

留學生們對於人類館的激烈反應，並不僅止於發表文告宣洩情緒。他們一方面求助於大阪的有力華商孫淦(字實甫)，希望藉由華商團體向主辦單位施壓，取消有關中國人的展出。²⁶另一方面，他們也報

²⁶ 參見《浙江潮》第 2 期中〈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一文的文末補充說明，和〈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二次報告〉，頁 15。

請清中國駐神戶領事蔡勛和駐日本公使蔡鈞透過外交管道，要求日本政府出面解決此事端。在同一期間內，留學生會館也公函預定前往大阪博覽會觀賞的清國官商，要求以貝子戴振為首的參訪團，必須以國家體面為重，中止其參與大阪博覽會的計畫。孫淦在經過為期約兩週的交涉過程後，在2月27日時已從大阪府的警署得知側面消息，了解日方原則上已決定中止支那人展出的計畫，但最後的決定尚待正式開會裁定。²⁷

在東京方面，清駐日公使在2月23日左右，向日本外務省表明人類館展出內容，有侮辱清國人的顏面之嫌，要求日本政府進行干預。日本外務省因此在2月23日開始介入此事件，行文大阪博覽會主辦單位進行關切。從日本外務省有關此事件的交涉檔案資料看來，外務省官員一開始也不明白人類館和大阪博覽會之間的行政屬性，對於人類館展出的內容和主旨也不清楚。不管是清國公使或是日本外務省原先都誤以為博覽會的主管單位為農商務省，後來才知道由民間團體出資經營的場外的餘興設施，包括人類館、不思議館、和世界一周館等，是由大阪府知事所管轄。²⁸所以博覽會主管在2月26日給外務省的回函中，表示已將外務省的關切信函轉送至人類館的主管單位大阪府。²⁹從外務大臣、日本駐清公使、大阪府知事和相關官員之間針

27 見孫淦給清國留學生會館的第二次書信報告，刊於〈博覽會事件〉，《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二次書信報告》(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1903)，頁16-17。在2月27日時，大阪府方面事實上已收到來自外務省針對人類館的關切信函，這封信函應是大阪府方面考慮對人類館展出計畫下令變更的重要影響因素。

28 菅野正，〈大阪博覽會(一九〇三年)と中國〉，頁130-131。

29 〈二月二十六日 博覽會事務局 庶第38號〉，《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大阪における人類館より清国人除去の件」》，收入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史料，《大阪ニ於イテ第五回内國勸業博覽會開設一件》，第4

對此事件的意見看來，他們主要的關懷焦點是要維護日本政府冀望藉由博覽會促進兩國貿易的苦心，不能容許橫生事端破壞大局，因此責成大阪府出面解決此風波，最後，大阪府知事在3月4日正式行文外務省，報告已下令人類館方面取消有關中國人展出的決定。³⁰但是此次風波並未就此打住，它所引起的中國方面的輿情反應才方興未艾，更多事件議題像滾雪球般捲入其中，使其歷史意涵不斷擴大。

雖然3月10日正式開幕的人類館的展出人種中，因為上述的抗議和外交交涉結果，並未有原定計畫中的支那人現身；但是在中國境內的報紙並未及時地報導澄清此新發展。此外，許多報紙將他報的舊聞轉載的作法，也使有關這一發展中的事件的訊息極為紊亂，包含日本駐中國的外交官都感受到此事件在中國的負面輿論效應。在不曉得人類館的有關中國人展出計畫已中止的情況下，日本駐清國公使內田在3月9日，以氣急敗壞的語氣，向日本外務省長官報告此事件對中日兩國關係的傷害。在此機密報告中，他指出留學生們以為人類館展出支那人的目的，是為了公開羞辱中國人的計謀；因此他們要求此展覽若不取消，將力陳清國貝子載振和那桐等高官等取消前往大阪博覽觀賞的情況。為了維持兩國之間的良好關係，內田強力請求外務省介入取消有關中國人的展出。³¹外務省隨後在3月16日回覆內田此項展

卷(1903)。(按：此為原始書信檔，沒有頁碼編列)

30 有關這時期交涉過程的細節，可參閱呂順長，〈大阪人類館事件における中國側の対応について〉，頁102-105。《湖北學生界》第3期中，有〈人類館停罷〉一文報導，將人類館中止展出中國人的計畫變更，全部歸功於孫渝向日本官方交涉的結果。這樣的評價與事實有些出入。日本政府以商業利益為重，由外務省主導介入干預整起事件，恐怕才是促成人類館計畫變更的一項重要因素。見〈人類館停罷〉，《湖北學生界》，3(1903)，頁106-107。

31 見其報告於〈三月九日 外務省機密第二八號 清國の体面に関する陳列

出已中止的訊息。然而 3 月 18、19 日間又爆發韓國方面也因不滿人類館展出包含韓國人，因而向外務省抗議的情況。外務大臣在 3 月 19 日，再度發函大阪府要求取消韓國人的展出，並確認先前中國人的中止展出命令是否有確實執行。在此機密文件中，外務大臣痛陳日本政府和民間上下努力強化和中韓兩國的關係，特別是希望藉此次大阪博覽會促進貿易關係的許多努力和美意，都被人類館的不當展出嚴重破壞，因此強烈要求大阪府嚴格執行去除清韓兩國人展出的命令。³²

日本外務省意識到此事件必須要有公開說明的動作，以平息媒體導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於是命令駐上海的助總領事在 3 月 29 日的《中外日報》上刊登以下的說明：

照錄日本駐滬總領事小田切君來函○敬啟者，中歷二月初七日
貴報紀大阪博覽會內，有坪井氏設人類館將清國人列入野蠻種
類事一條；十一日貴報要事彙誌內，又載此事且記寓居大阪華
商已設法阻止等語，當經函詢本國去後接准復函，內稱此事原
與博覽會無涉，且此館係喪心圖利之市僧所設，其所在非在博
覽會場內，惟藉開會為機緣，設於博覽會附近地方，以致有此
等謬傳。大凡遇有此等機會，畢集異國人將其風俗衣食居處等
事供人觀覽，歐美各洲不乏此例。然於人類館中將友邦人民列
入供人縱覽，頗覺不可。故該館列清國人事，大阪府知事得悉，
已嚴諭禁止矣。緣有此等謬傳妨害清國人之情誼甚為不佳，請

品取除及に付具申の件》，《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大阪における人類館より清国人除去の件」》，收入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史料，《大阪ニ於イテ第五回内国勧業博覽會開設一件》，第 4 卷(1903)。

³² 見〈三月十九日 小村大臣より大阪府知事宛，人類館より清韓兩国人を
除去せしむるべき旨内訓〉，《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大阪における人類館
より清国人除去の件」》，收入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史料，《大
阪ニ於イテ第五回内国勧業博覽會開設一件》，第 4 卷(1903)。

即將此情節函達中外日報。以闢淆聽云云。³³

這一份中文聲明可謂是代表日本政府針對人類館的定位和整起風波的公開立場。它主要的目的並非要仔細澄清人類館的展出內容和目的，而是要明白地和人類館「劃清界線」。從它以「喪心圖利之市儈所設」的詞彙，來界定這一項由東京大學教授所主持設計的展覽看來，日本政府迫切要將大阪博覽會(官方主辦機構)，和此人類館(私人營利機構)撇清關係的用意非常明顯。雖然聲明中提到歐美也有展出異國人的類似先例，但強調日本官方基於友邦人士不宜被展出的考慮，已經斷然下令其中止展示清國人的計畫，以維護兩國之間的情誼。同樣的聲明也發送至天津、廈門、漢口等 11 處日本領事館，向中國各地加以澄清此事件中日本政府的立場和政策。從日本政府外交部門的大動作，可以看出此件風波在中國所引起的波瀾。

(二)野蠻人具體化——誰是野蠻支那人？

1. 纏足女和鴉片男

日本報云，大阪博覽會設立人類館，將各國人文明野蠻風俗一一描寫裝置其中，而中國之喫洋煙、裹雙足種種苦狀，亦與於野蠻之列。³⁴

上述報導是出自 1903 年 3 月 9 日的《大公報》，也是有關人類館的中文大眾媒體報導中，第一次具體地提到了鴉片吸食和纏足在人類館

³³ 《中外日報》(上海)，1903 年 3 月 29 日。此外，在此聲明中所提及的中曆 2 月初 7 日和 11 日(分別為西曆的 3 月 5 日和 3 月 9 日)報導，即是《中外日報》從 2 月 24 日和 3 月 1 日的《大公報》所轉載的新聞。它們的詳細內容見下文分析。

³⁴ 《大公報》(天津)，1903 年 3 月 9 日。

展出中扮演的角色。在上一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關於人類館新聞的中文相關反應，無論是〈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或是《新民叢報》的〈日人侮我太甚〉中，強調的重點都是在於中國人(支那人)被日本人列為野蠻人的所引發的悲情和指控，但是都沒有提到人類館會以什麼樣具體的形象來再現野蠻的中國人。也因此上述3月9日《大公報》的報導，特別值得注目。由於它對於日後有關人類館展出內容的論述，有深遠的影響，我將會仔細地探討其消息來源。但在進行此分析工作之前，讓我們先了解當時的媒體最初是如何報導此事件。雖然人類館在3月初時，已決定取消有關中國人部分的展出計畫，但是它先前所引發的風波，在媒體傳播的效應上並未因此而結束。最早在中國境內報導相關消息的媒體，應當是在中國天津發行的《大公報》。在它2月24日針對有關博覽會的新聞中，有以下的評論報導：

又云日本理學士坪井氏研究人種學者，近日倡議於會內設[人類館]，並陳列野蠻各人種焉，如蝦夷、臺灣、高麗、安南之類，而支那亦與其列。吾支那果自認為野蠻耶？果聽人之列我於野蠻耶？此舉若果行，吾恐我國人在世界上無復立錐之地也！³⁵

這篇報導對於人類館的展出計畫細節的陳述並不確實，例如有關展出人種部分，並未提及印度和琉球，反而提到了安南；並且也以為人類館是博覽會是場內設施。但是它所理解和強調的重點，亦即支那人也要被視為野蠻人的方式展出，及因而所表露出的悲恨恐慌情緒，則和前述留學生們的反應一致。雖然此篇報導刊出時，日本政府已介入處理此事件，但作者顯然不知情，因此並未提及任何日本官方的行動。

³⁵ 《大公報》，1903年2月24日。

值得注意的是，此則新聞又幾乎原封不動地為 3 月 5 日發行的《中外日報》所轉載，雖然當時此事件的發展已有重大變化；但不知情的讀者極有可能仍被「舊聞」誤導。事實上，中國境內的媒體對此事件的大幅報導和評論，大都是在 3 月以後，而許多讀者的反應也因此是針對「舊聞」而發，因而產生一些光怪陸離的評論。大公報針對此項新聞的後續報導，出現在 3 月 2 日的〈時事要聞〉欄中：

日本專函云，日本理學博士坪井氏倡議於大阪博覽會場內，設立人類館並列支那人於野蠻人種之類，已紀前報。茲聞此事，業已運動寓居大阪華商，已設法阻止。如不得已而陳列，亦須分清是何部分，不能目支那全體皆為野蠻也，嗚呼亦可悲已。

事實上，此條報導刊出時，前一天，亦即 3 月 1 日的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刊出的〈支那人風俗展覽中止〉報導，已指出因為清國公使要求停止有關中國人的展出，日本政府已經介入此事件。但《大公報》的報導，仍僅有報導有關大阪華商(即孫淦)的抗議活動，而且其中所述的談判立場似乎有軟化的情況——如不得已而陳列，亦須分清是何部分，不能目支那全體皆為野蠻也——應是空穴來風，這和上述孫淦的強硬態度有所出入。³⁶從此篇報導和先前(2 月 24)的報導內容看來，他們同樣抱持著人類館即是野蠻人展的看法，但是對人類館展出的詳細內容並不清楚。然而在此之後，亦即 3 月 9 日的後續報導中，情況卻有了大轉變。由於 3 月 9 日的《大公報》和 3 月 1 日的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刊出的〈支那人風俗展覽中止〉，以及 2 月 23 日由日本外務省所發送出的一項日本官方照會等三項文件之間有密切關係，以下我先將這三項文件的原文依時間序列出：

³⁶ 但是此項報導，卻引發一些讀者的另類恐慌，我在後續討論中將會提及。

2月23日 〈有關博覽會支那人風俗陳列案〉(由日本外務省發文至博覽會事務局)

清國駐在本部公使在今天特別派翻譯官來報告我們的是：因為聽到在這次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之際，有設置支那人吸鴉片及支那婦人纏足的狀態作為支那風俗，而讓一般觀覽者觀看的計畫之一事。若上述說法是事實，將支那風俗中最令人嫌惡的狀態展示，對支那人來講，會因此受到侮辱的。因此希望這個計畫取消，……如果將它們作為臺灣人的風俗，將之在臺灣館內陳列也是一樣會對支那人的感情產生傷害，因此希望這次展出能夠停止。³⁷

3月1日 《大阪朝日新聞》 〈支那人風俗展覽中止〉

博覽會之際，有這樣的說法會有設置人類館而使人隨興觀看的計畫。因此最近東京的清國公使將翻譯官派到外務省說，作為支那風俗，將支那人吸鴉片以及支那婦人的纏足的狀態使人觀看，但這會傷害該國人的感情是理所當然的事；為了臺灣人的風俗展現，將之在臺灣館陳列，也是一樣傷害支那人的感情，希望這樣的計畫停止。因此(外務省)有對博覽會事務局進行有關

37 〈二月二十三日 博覽會支那人風俗陳列に関する件〉，《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大阪における人類館より清国人除去の件」》，收入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史料，《大阪ニ於イテ 第五回内國勸業博覽會開設一件》，第4卷(1903)。日原文如下：「本部駐在清國公使は本日特に通訳官を遣わして申出候趣に拠れば、今般第五回内國勸業博覽會に於て、支那風俗として支那人を亞片を喫し及同婦人の纏足せる状態を為さしめ、一般來觀者に縱覧せしむるの計画を為すもの有之由伝聞致候処、右は事實とすれば支那風俗中最も嫌惡すべき状態を示せるものにして、支那人に取りては侮辱を蒙りたるの感を惹起候に付、同計画差止方取斗度様、……もし臺灣人の風俗を示せるものとして之を臺灣館に陳列するも均く支那人の感情を害すべき儀と存候間、是亦御差止相成様致度候。」

此展出計畫的詢問，據了解其手續應該在府廳間進行。³⁸

3月9日 《大公報》

日本報云，大阪博覽會設立人類館將各國人文明野蠻風俗一一描寫裝置其中。而中國之喫洋煙、裹雙足種種苦狀，亦與於野蠻之列。刻下駐東京清國公使遣通譯官赴日本外務省陳說，該館描塑支那風俗甚為的當；惟內列支那人之喫洋煙及婦女之纏足種種苦虐情形，逼肖逼真，使萬國環觀，未免大失國人體面。請將此項計畫設置者停止云云。聞事務局已有照會往該府廳囑其暫緩部署矣。

2月23日的文獻資料是日本外務省總務長官珍田捨己給大阪博覽會事務官長安廣伴一郎的照會(當時外務省還以為人類館是博覽會事務局所規劃安排的展出設置)。在其照會中，他引述了清國公使透過翻譯官所表達對人類館展出的意見。從行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清國公使並未如〈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的作者一般，以直斥人類館是野蠻人館作為訴求，而是以人類館將會展出鴉片吸食和纏足——中國人本身深惡痛絕的兩樣陋習——供人觀賞的傳聞，說明此舉若是屬實，將會令中國人有嚴重受辱的理由，要求中止人類館有關中國人展出的計畫。3月1日的《大阪朝日新聞》的報導，基本上是以清國公使的說法為主，然後說明日本政府已針對其請求，進行後續的回應。然而在3月9日

38 〈支那人風俗の縱覽差止〉，《大阪朝日新聞》，1903年3月1日。原文如下：「博覽會に就き人類館を設け各國の風俗を寫して縱覽せしめんとの計畫ありとの說ありしより頃日東京駐劄清國公使は通譯官を外務省に遣はし支那風俗として支那人を阿片を喫し及び同婦人の纏足せる状態を縱覽せしむるときは同國人の感情を害するは勿論臺灣人の風俗を示さん為之を臺灣館に陳列するも均しく支那人の感情を害すべければ斯る計畫は差止めありたき旨申出でたる由事務局へ照會あり府廳にて其手続きをなす筈なりと。」

的《大公報》的轉述中，此條新聞的性質卻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由外務省發出的照會或《大阪朝日新聞》中，有關人類館展出內容，尤其是所謂纏足和鴉片方面的關連，都清楚地載明那是出自於清公使口中的說法；可是在《大公報》的陳述，卻成為「日本報云大阪博覽會設立人類館將各國人文明野蠻風俗一一描寫裝置其中而中國之喫洋煙裹雙足種種苦狀亦與於野蠻之列」，亦即人類館將展出纏足和鴉片吸食，而且是將此兩項風俗視為野蠻行為的方式展出，變成是日本報紙所報導的事實陳述。而清公使是在此「事實」的前提下，向日本政府提出停展的要求(有關清公使口中有關纏足和鴉片的傳聞，究竟源自何種消息管道，我們將會在下一節中仔細探討)。換言之，在如此有意或無意的扭曲轉述下，傳聞成了事實，也成為後續評論的基石。在〈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和《新民叢報》中的〈日人侮我太甚〉論述中的抽象野蠻人，在此報導中具體化為纏足女和鴉片男；而所謂的「一二舊俗，腐敗之態」或是「惡習蠻風」也順理成章地具體化為纏足和鴉片吸食。簡言之，3月9日《大公報》的報導，可以說是立基於先前「人類館即是野蠻人館」的認知架構上，然後從日本的報導中，汲取了新的「養分」後，終於揭露了日本人為了要展現「野蠻的中國人」計謀中，所精心規劃的纏足女和鴉片男兩個主角。由此報導所引發出的人類館展出纏足女和鴉片男活人秀具體畫面，無疑具有前所未有的媒體效應。

果不其然，在此條新聞報導之後的次日，《大公報》即以題為〈論日本人類館刻畫中國人吸煙纏足情狀事〉的大篇幅〈論說〉中，發表充滿強烈情緒的言論：

今聞大阪博覽會所設人類館，竟刻畫中國人吸鴉片纏雙足之情狀，裝置其中以為野蠻人類。吾不禁為中國人羞，為中國人憐，為中國人歎惜痛恨而不能自己，彼人也我亦人也，同此人類而

獨令我黃帝之子孫、文明之種子不得揚眉吐氣於新天地中，更作種種醜態，以取笑於廣眾墮我聲名，失我體面，而長夜漫漫真有令執筆人，飲淚垂涕自不禁悲從中來者。

噫！我中國乎果遂自居於野蠻乎？我中國人乎果遂自認為野蠻乎？此事吾不敢為日本答，而亦不必為日本答。人必自侮然而人侮，我中國人先自有取侮之道，而後人乃從而侮之。責己而已，責人何為乎？夫吸食鴉片為中國人之一大病，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吸食鴉片為人生之一大缺點，亦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然決意痛戒者，曾有幾人？³⁹

作者對於日本人居然將「黃帝之子孫、文明之種子」中國人視為野蠻人的作法，也和留學生們同樣感到憤憤不平。然而，弔詭的是，雖然評論者面對如此不堪的人類館景象，感到身為中國人的悲哀和羞辱，但是纏足女和鴉片男的新具體形象，在評論者的眼中，似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合理化」了日本將中國人置於野蠻人之列的作法。換言之，根據《大公報》先前的報導，日本人的作法，雖然如此地粗暴且充滿挑釁，但以纏足和鴉片吸食代表野蠻人的行為，似乎又是「正中要害」，讓受辱者陷於深感屈辱但又覺得無言可辯駁的窘境。作者對於吸食鴉片和纏足現象痛恨至極的情緒，以及無法革除其流行於中國的無力感，均可謂是溢於言表。質是之故，作者最終以「人必自侮而人侮」的角度，重新界定人類館事件對於中國的多重意義。但也因為如此，更加深了日後有關人類館的報導和評論中，人類館／野蠻人／纏足女鴉片男三者之間的密切關連性。例如在3月18日，也就是人類館已正式登場後的八天後，《大公報》終於正確地報導出，人類館

³⁹ 《大公報》，1903年3月10日。

有關中國人展出的計畫已取消的消息。⁴⁰但是報導中依然以「人類館將中國吸煙纏足者列入野蠻之類」的行文，界定了它原先的展出計畫。

在此如此情況下，即使已知道先前所勾勒的「駭人聽聞」的展示景象，並未真正的「家醜外揚」，可是它所激發出的野蠻恐慌，卻並未因此而消歇；尤其是在「認定」是纏足和鴉片吸食的兩項「惡習蠻風」，正是讓外人能理直氣壯地嘲笑中國人為野蠻人，讓所有中國人因而蒙羞的新理解下，纏足女和鴉片男更成為評論此事件的焦點。這種「欲抗外侮，先除內賊」的心理，充分地呈現在3月20日《大公報》的另一篇題為「敬告吸煙纏足者」的〈論說〉中：

夫日本人類館刻畫我中國人吸煙纏足之情狀，列入野蠻之列。
此正如詈我擊我涕唾我也。然約計我通國中人不知羞不知痛而
猶安之若素者，殆不啻十之八九。……日本雖將此舉廢止，而
中國人野蠻之名已早飛騰於大地之上，固不必俟萬國得見其刻
畫情狀，始足為中國人羞也即其既舉而復廢，我中國人即已掛
名於野蠻之簿列，銜於野蠻之班。⁴¹

從歷史的後見之明而言，這些有關人類館的評論文的立論基礎——大阪人類館以纏足女和鴉片男的活人展出，代表中國人加入野蠻人大集合，供世人觀賞嘲笑的景象——不僅是一個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實，而且所謂這樣的安排是在原先展出計畫中的說法，也是源自於清國使口中的傳聞。然而，為何這樣如此薄弱的事實基礎，會引發如此劇烈的反應呢？首先，我們必須留意，從一開始留學生們或是《新民叢報》關於人類館展出計畫的理解，即是定位這是日本人要在世人面前

⁴⁰ 此報導僅有短短一行文字，相當不顯眼，全文為「日本大阪博覽會人類館將中國吸煙纏足者列入野蠻之類已紀前報茲得日本電云該會已議將此舉廢止云」，刊於《大公報》，1903年3月18日。

⁴¹ 《大公報》，1903年3月20日。

醜化中國人為野蠻人的邪惡計謀。在這樣的理據前提下，任何有關展出內容的傳聞或空穴來風，都成為強化原先詮釋的生力軍。更何況，誠如先前的分析所指出，在《大公報》評論者的眼中，鴉片吸食和纏足兩項行為的確是「野蠻」的行為。從此角度而言，纏足女和鴉片男是否真的是人類館的展出內容已非重點，反而可以說遠在日本大阪的人類館，已成為當時中國反纏足和反鴉片運動者，內心最大的夢魘所投射的舞臺：雖然經過他們多年不斷地努力宣傳，纏足和鴉片吸食現象依然充斥中國，這兩種無法根除的「惡習蠻風」所造成的中國之「家醜」，終於在日本人的詭計下，傳千里而公諸於世，使得「中國人野蠻之名已早飛騰於大地之上」。

從中國清末開始形成的反纏足和禁鴉片運動的發展脈絡而言，1903年的大阪人類館事件發生的時機，恰好讓它足以扮演上述讓「家醜終究外揚」的邪惡角色。誠如相關研究指出，纏足作為一種國恥和有害國民身體體質的論述，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可謂進入了其高峰期。在戊戌維新前後期間，各地區的反纏足會或天足會紛紛成立；即使在戊戌政變失敗後，反纏足運動受其影響而聲勢稍歇，但在1901年清廷重新表態支持反纏足運動後，可以說反纏足已是跨越不同政治改革主張者共同支持的運動。⁴²然而纏足的習俗或是身體形態的變更，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能夠立竿見影看到成效的改變，這也是何以人類館的展出，會被中國評論者視為是將中國當時亟欲革除之「家醜」，不顧情面地公諸於世的粗暴作法。但是除了這樣情緒性心理投射因素外，人類館的展出能夠和中國反纏足運動「配合演出」，

⁴² 有關反纏足運動發展的經過，可參閱鄭永福、呂美頤，《近代中國婦女生活》（合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21-52；關於纏足和國恥之間的連結關係，見坂元ひろ子，〈足のディスコース——纏足・天足・国恥〉，《思想》，907（臺北，2000.1），頁145-161。

這其中還有一個更微妙的反諷因素。眾所皆知，將中國婦女的原本隱密的「三寸金蓮」，以現代視覺科技(例如小腳 X 光片)的方式，將其脫離原本的文化脈絡和身體審美價值系統，視之為野蠻象徵的現象，並將其污名化公諸於世的作法，正是清末反纏足運動宣傳上經常運用的手段。簡言之，將纏足小腳的照片或 X 光片，作為「野蠻」的象徵公開展示供人評論的「小型展覽會」現象，約從 1895 年之後，即在中國的反纏足宣傳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⁴³由此觀之，當《大公報》評論者在 1903 年抱怨日本人將在博覽會中展出纏足時，雖然他們對其實際內容的認知非常有限，可是在中國已流行多年的反纏足宣傳會上，種種將纏足小腳「赤裸地」公諸於世的情景，即足以令他們聯想投射到遠在日本大阪所會呈現的不忍卒睹、令人難堪的畫面；但是另一方面，人類館是在國際參與的博覽會場合中，呈現如此不堪的畫面供人嘲笑。正是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雙重性質，使人類館的展出(即便是想像建構下的產物)讓中國的評論者產生五味雜陳的情緒反應。

同樣地，反鴉片運動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清中國漸漸成為改革思想的重要主題。誠如 Frank Dikötter 所指出，從 1880 年起，由傳教士為主的反鴉片運動，強烈抨擊吸食鴉片是嚴重道德墮落的行為；在戊戌維新時期改革派知識份子，在強國必先強種的信念下，也視鴉片吸食為傷害國民身體的惡習。到了二十世紀初，在各種反鴉片運動宣傳的努力下，鴉片被認為是危害民族生存和道德敗壞的重要原因，已成為主流論述中根深蒂固廣植人心的看法。⁴⁴簡言之，到了二十世紀初，纏足和鴉片吸食已成為改革或革命論述中，為了強國

⁴³ 有關此現象，參閱苗廷威，〈從視覺科技看清末纏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5(臺北，2007.3)，頁 1-45。

⁴⁴ Frank Dikötter, Lars Laamann &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93-111.

保種所必須除的「惡習蠻風」。⁴⁵激烈的婦女革新運動者金松岑，在其 1903 年出版的《女界鐘》中，除了痛斥纏足行為是「蠻俗、惡習、惡風俗」外，更明言「從古滅種亡國，皆由於自造，而非人所能為，今吾中國吸煙纏足，男女分途，皆日趨於禽門鬼道，自速其喪魂亡魄，而斬絕宗祀也，我同胞其念之矣！」⁴⁶雖是短短數語，可謂道盡了當時反纏足反鴉片運動的核心關懷。

然而在此期間，拜現代視覺科技的進步，各式各樣描繪中國人吸食鴉片或纏足女子的圖片或照片，依然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廣為流傳，成為展示中國人意象的醒目媒介。⁴⁷而在 1867 年巴黎的萬國博覽會中的「中國館」中，現場展示異國風情的畫面，即是幾位纏足女性，抽著香菸和鴉片煙的景象。這樣的景象也正是《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所觀察報導的焦點之一。⁴⁸事實上，在《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二次報告》

⁴⁵ 當然，從歷史的發展變化而言，將纏足和吸食鴉片視為陋習或不文明的行為，都是近代中國文化價值重大轉變的例子。纏足曾在長遠的時期中，被傳統社會文化價值，視為是女子出身於有教養家庭必備的身體「模塑」，也是一種文明女人才會有的身體樣貌；同樣地，吸食鴉片也曾是上流社會展示身份和從事社交活動的重要行為。對這些觀點的討論分析，詳見 Dorothy Ko, “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man’s History*, 8:4 (Winter 1997), pp. 10-26; Frank Dikötter, Lars Laamann &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pp. 46-73.

⁴⁶ 金一著，李又寧主編，《女界鐘》(紐約：紐約天外出版社，2003)，頁 57。

⁴⁷ 例如在 1901 年出版的一本英文介紹世界人種的書籍，在有關中國人的部分有 18 張照片介紹形形色色的中國人，其中 1 張即是 4 位男士吸鴉片的照片，另外 1 張則是女子側坐並陳示裸露小腳的圖片，見 H. N. Hutchinson, et al, *The Living Races of Mankind: A Popular Illustrated Account of the Customs, Habits, Pursuits, Feasts & Ceremonies of the Races of Mankind throughout the World*, Vol.1 (London: Hutchinson, 1901), pp. 125-126.

⁴⁸ 苗廷威，〈從視覺科技看清末纏足〉，頁 30-31。

中針對大阪人類館事件的回顧報告，即是以上述巴黎博覽會的情形作為前車之鑑，「合理化」其針對大阪人類館事件所作抗議為「先發制人的攻擊」(preemptive strike)，以免在其眼中的「野蠻中國人」，被活生生地陳列於博覽會的世界舞臺的醜事會歷史重演。換言之，當留學生們聽聞人類館展出的消息時，一方面，他們對過去有關纏足和鴉片即野蠻人之間的關連的歷史經驗，可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如何看待這次人類館的意義和可能的內容，也因而產生了一連串的激烈反應；另一方面，他們一開始在翻譯《國民新聞》中所擅自提及的《世界風俗寫真帖》，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此舉使他們將人類館有關支那人的展出和鴉片與纏足三者之間互相連結起來。關於此連結的產生，我將會於文後仔細分析。

但無論鴉片男和纏足女是否真的是人類館的原始規劃，對於中國方面關心此事件的報紙讀者或是日後回憶此事件者而言，3月9日的《大公報》有關纏足、鴉片和人類館相關連的報導，已成為牢不可破的事實陳述。例如在3月12日的《中外日報》關於人類館的報導評論中，雖然認同日本政府後來的公開的說法，亦即人類館是「圖利之商人」的「惡作劇」，也提到日本政府介入禁止展出中國人的計畫，但卻也提到人類館暗中又想展出中國纏足女的陰謀，「然臺灣人形式與我相同，彼已雇臺灣之纏腳女丐，年二十者一人置館中。」⁴⁹由此例可見，人類館被認為企圖要不擇手段展現野蠻中國人(以臺灣纏足女假冒充斥)的說法，已經成為當時中國媒體界普遍認知。然而，除了這一種普遍認知外，另一個因人類館而引發的讀者恐慌現象，所反映投射出的另一種「野蠻的中國人」，也凸顯了晚清社會另一個緊張矛盾關係。

⁴⁹ 〈東遊聞見錄〉，《中外日報》，1903年3月12日。

2. 野蠻的滿洲人

在中國境內，除了《大公報》以外，《中外日報》也對人類館事件持續追蹤報導，事實上《中外日報》在此 1903 年 3 月期間中的 12、17、20、22、23、26、28 等日，均有針對人類館的新聞報導或評論。其中 20 日的報導如下：

北京旗生續彪吉祥等，因閱報章知今年大阪博覽會場中，有日本設立之人類館，將列中國人於野蠻種族之內。迨大阪華商出面力爭有如不得已必須分清部份等語，深恐將滿洲族列入野蠻種內。遂於日前聯名上書外務部那侍郎桐，請為設法阻止，聞那侍郎已據情照會內田公使，轉請日本政府查禁；並一面函囑蔡公使鈞設法阻止。又聞續等，近日在東京遍邀滿蒙有志之士集議，擬有公啟寄致日本留學生，諷其就近力爭云。⁵⁰

這則報導中所言「迨大阪華商出面力爭有如不得已必須分清部份等語」即是前述 3 月 1 日《大公報》報導中所提到的、大阪華商在談判過程中所採取的一個似乎是妥協的立場——如不得已而陳列，亦須分清是何部分，不能目支那全體皆為野蠻也。雖然從其他文獻證據看來，此項報導應是空穴來風，可是在旗人續彪等人的理解中，此談判過程背後可能埋藏另一種陰謀——滿洲旗人將會在這場由漢人主導和日本人的談判中，成為最後的犧牲品，被「選定」為是支那人中的野蠻人，供日本人陳列以成為全世界之笑柄。雖然此種陰謀論，看似杞人憂天，但是從報導中，續彪和清國官員那桐(鑲黃旗人，時為戶部右侍郎，也是清國派往日本參觀博覽會大臣)的反應看來，又似乎是將此可能性加

⁵⁰ 《中外日報》，1903 年 3 月 20 日。

以嚴肅看待。事實上，在3月12日的《大公報》中，續彪等的〈上那琴軒侍郎書〉的全文是以〈要件代論〉的方式刊出。文中前半段的論述主旨，和其他中國輿情對此事件的看法一致，主張要強力抗議日本人將支那人列入野蠻人的作法。但是後半段中，針對所謂大阪華商談判過程中所採取的妥協立場(如不得已而陳列，亦須分清是何部分，不能目支那全體皆為野蠻也)，這些滿洲人的恐慌可謂溢於言表：「夫中國之民只旗漢兩部，既曰分清不得目支那全體皆為野蠻，則八旗人豈能幸免哉！外間革命黨仇滿會，皆以八旗為集矢之的，以庚子之變皆旗人所釀成也。」由此反應看來，如果說人類館展出在清國留學生會館的理解中，是日本人要公然羞辱中國人的「陽謀」；那麼在這些旗人的眼中，這個陽謀可能將要轉變為日本人和漢人聯手羞辱滿人的陰謀。尤其在此文末中所描繪的恐怖景象——不然貝子大人玉佩鏗鏘，往臨彼而忽覩同胞之芸芸，列入蠻種之蠹蟲，萬目之下其將何以自容耶！——亦即滿大人將會在日本大阪參觀由滿人作為野蠻人展出的不堪畫面，更可以看出由人類館事件所牽動出的複雜情緒，不僅包含了當時中國人對於中國國族整體而言，在國際地位淪為野蠻人的恐慌心情，更也觸動了當時中國國內滿漢族群之間的恩怨情仇。

事實上，如果續彪等人能夠有機會仔細了解坪井正五郎的人種分類觀，那麼他的一切有關人類館的焦慮都是多餘的。因為坪井正五郎所定義的「支那人種」即是所謂漢人，並不包含滿洲人。例如在人類館展出的世界人種地圖中，坪井以各種族(共50族)的人物小模型，分別標示號碼立放在世界地圖上其主要居住地。在種族民對照表中，標號第8「支那種族」的下方還特別加註「清國漢人」。⁵¹此外，當坪

⁵¹ 見坪井正五郎，〈人類館と人種地圖〉，《東洋學藝雜誌》，20：259(東京，1903.4)，頁163-166。

并談論到支那人和滿洲人時，都是明確地以兩種不同人種界線區分。例如他在談到纏足風俗時，即明確指出此為支那人的習俗。而支那人留辮乃是臣服於滿洲人的結果。⁵²的確，在當時日本一般大眾的言論中，「清國」和「支那」常混用，而且對人類學家的分類方法也不清楚。媒體在報導人類館事件時，也常將支那人的展出計畫寫成清國人的展出計畫，但如此一來卻是模糊掉了坪井正五郎原本的區分，甚至上述外務省的文書中，也是以「清國人展出」的字眼來檢討人類館的計畫。而中國方面的報紙，也都是直接以中國人(即當時清國所統治之人，包含滿漢等各種人)去定義支那人的方式，來報導此事件。如此看來，也難怪續彪等人會憂心忡忡了。⁵³

換一個角度而言，如果我們能以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國勢衰敗的大局勢變化，和留學生們心理上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來「同情地理解」他們為何從一開始，就認定人類館的展出計畫是日本人精心策劃的陽謀；那麼我們或許也可以從晚清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的脈絡，來理解為何旗人為何會認定滿人，而不是纏足女和鴉片男，極可能會是這場

52 坪井正五郎，〈支那男女風俗〉、〈支那婦人の纏足〉，收入於坪井正五郎、沼田賴輔編，《世界風俗寫真帖》，第26、28節；在他所校閱的《人種誌》一書中，以地緣作為區分，滿洲人和日本人種等列於「西比利亞利種族」項目之下，而支那人和西藏人等則列於「支那的種族」項目之下。參見坪井正五郎，〈人類館ご人種地圖〉，頁165。

53 實事實上，在1903年2月22日刊行於《臺灣日日新報》的一則有關人類館的工件人員在臺灣招募生番的報導中，間接地提到人類館展出的旨趣，其中引述1位不具名的人類學家(極可能是坪井正五郎)的想法，說明此次人類館展出所具有的學術性、藝術性和娛樂性(集不同人種於一堂，演其特有的風俗和舞樂)，並提到希望下一次的博覽會時能擴大規模，招募更多不同的東亞人種，其中在支那地區的部分，即言明包括吉爾吉斯(Qirghiz)、蒙古和滿洲。所以如果此項報導所言屬實，續彪等人的擔憂是「早熟」(premature)的，因為就大阪博覽會期間而言，滿洲人的展出並不在規劃之中。

「誰是野蠻中國人？」的「選拔賽」中最後的祭品。如果說，當時大部分的中國輿情和留學生們，是從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文化問題層面，思索是哪些「惡習蠻風」使得中國人成為外人眼中的野蠻人，進而認定纏足女和鴉片男是罪魁禍首；續彪等旗人的論述，則是從二十世紀初中國內族群政治衝突的角度，尤其是革命陣營的反滿仇滿論述，對於滿人所造成的心靈壓力（「外間革命黨仇滿會，皆以八旗為集矢之的，以庚子之變皆旗人所釀成也」）的現象，來推理揣測人類館事件最後可能演變的結果。

眾所皆知，在傳統中國的族群論述中，滿人被視為蠻夷之人並非是晚清獨有的現象。無論是在清初的激烈反滿言論，例如王夫之立基於「夷夏之防」的反滿論述，或是在太平天國將滿人視為妖魔鬼怪的政治宣傳中，將滿人視為低劣族群，進而否定其統治正當性的言論屢見不鮮。然而清統治階層在面對這些論述挑戰時，往往也能引經據典，以儒家文化價值守護者的立場，駁斥反滿言論中「狹隘」的漢人中心族群思維。但是到了清末，清廷所標榜的「天下一統，中外一家，上下一體」的政治意識型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一方面，西方列強持續的政經壓力大幅削弱了清廷的統治威信；另一方面，反滿的革命言論，除了重彈傳統「夷夏之防」的舊調外，更以十九世紀西方的人種論，強化了滿漢族群之別的正當性。⁵⁴而以「野蠻異種」、「野蠻賤種」等字眼來形容界定滿人，可謂這些反滿革命言論的共同語言。例如孫中山即以「乃自清虜入寇，明社丘墟，中國文明淪於蠻野，從來生民禍烈未有若斯之亟也」，來界定明亡於清乃是代表文明

⁵⁴ 關於傳統的夷夏論和西方人種論在近代中國族群論述中「結合」的現象，參閱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エンダーゲー》(東京：岩波書店，2004)。

的漢人淪為野蠻的滿人的歷史悲劇。⁵⁵著名的興中會革命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國」更是明確定位反滿革命是滿漢族群鬥爭的政治衝突。在孫中山的反滿論述中，以漢人是「四千年文明之種族」相對於滿人是「東北一游牧之野蠻賤種」的類似論述，可謂是不勝枚舉。⁵⁶

晚清盛行之排滿言論，不僅界定滿漢為涇渭分明的不同種族，更以漢族中心的優越意識，強調漢人為文明的神明世胄，而滿人則是野蠻人(蠻種獸心)。這種帶有強烈「種族歧視」的滿漢區隔言論在二十世紀初，透過各類新興的傳播管道(如白話報刊、宣講、戲曲等)，已是大眾耳熟能詳的論述。⁵⁷換言之，無論大阪人類館的目的是否真如中國留學生們所指控的，是日本人帶有「種族歧視性」的動機，要將「支那人」整體鄙夷為野蠻人的陰謀；但在中國境內的反滿言論，早就赤裸裸地不斷以漢族中心的言論，將滿人「野蠻化」。另一方面，晚清時期許多革命黨人均以日本為活動基地，許多留日學生的言論也帶有強烈反清政府和反滿的色彩。如果從這些歷史背景加以考慮的話，續彪等旗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恐慌反應——懼怕滿人將會被漢人出賣，成為「野蠻支那人」在日本活人展出的代表——雖然看似荒誕不經，卻又好像其來有自，甚至值得同情。

三、消失的支那人

就歷史事實發展的角度而言，無論是較抽象的野蠻支那人，或是

⁵⁵ 出於孫中山 1896 年 11 月，〈覆翟理斯函〉，收入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47。

⁵⁶ 見孫中山，〈敬告同鄉書〉，《孫中山全集》，第 1 集，頁 232。

⁵⁷ 關於晚清時期新興媒介對於思想傳播的影響，參閱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具體的纏足女、鴉片男，甚至是「野蠻滿洲人」，都沒有在 1903 年 3 月 10 日以後的開幕的大阪人類館出現過。這些曾經被中國留學生們或中國媒體和憂心的滿洲人讀者所一一「點名」，應該會是日本人的暗中安排下，要代表支那人登上「野人大集合」舞臺的種種可能角色，都因為人類館的展出計畫變更，而在歷史的舞臺中缺席。但是，我們要追問的是，這些人物真的是原先被安排要上臺的角色嗎？或者，即使他們真的是被預定要出現在此次的人類館展出中，他們真的是被(可惡的日本人)安排要代表野蠻中國人嗎？或者，坪井正五郎所規劃的人類館的主要目的，真的是為了「再現」野蠻中國人，以供世人嘲笑嗎？又或者，這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陰謀，坪井不過是日本政府的工具，用人類館的展出來羞辱中國人？當然，對於中國留學生們和中國媒體，以及中國日後的公共記憶而言，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幾乎都是肯定的。⁵⁸而對於當時急於和人類館撇清關係日本政府而言，這些答案的是非與否並不重要，反正人類館是「喪心圖利之市儈所設」(日本政府的公開聲明)。另一方面，坪井正五郎事後對人類館整起風波的檢討，並未特別針對原始計畫中有關支那人展出的說明解釋，而是強調人類館場地空間的限制，使得實際展出的效果和他原先的設想有落差，因而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換言之，問題出在於他的人類學知識無法被完整地呈現，才會導致種種的誤解和批評。⁵⁹所以有關上述幾個

58 菅野正即認為，無論日本政府如何解釋澄清人類館的性質，對於清國人而言，人類館就是代表官方博覽會企劃中的一環，它有關中國人的展出內容即代表日本人的清國人觀。見菅野正，〈大阪博覽會(一九〇三年)と中國〉，頁 132。

59 在 1903 年 3 月 28 日的《大阪每日新聞》所刊出的〈博覽會と人類學(坪井博士の談)〉一文中，坪井正五郎針對此次展覽缺失的檢討，認為將各人種群聚於一空間有限的會場的展示方法不恰當，容易讓人誤解對人種有差別歧視待遇，他認為應將各國人種分散在會場中展出；另外，負責在 2

問題的回答，在主事者(坪井正五郎)可謂是沈默無言，但相關當事人(中國留學生們和媒體，以及日本政府)卻言之鑿鑿的情況下，要得到比較明確的答案並不容易。以下我將就從幾個面向加以深入探討和釐清。

首先，在我們先前追溯3月9日《大公報》關於纏足和鴉片新聞的消息來源時，我們留意到2月23日清公使向日本外務省交涉時，提到了有關纏足和鴉片吸食展出的傳聞。我們不免好奇清公使口中，所謂的傳言究竟源自何處？由於清公使並未明言其消息來源，而且在2月23日前，有關人類館的展示規劃並未有進一步消息公布。此外，鑑於清公使的外交交涉是在中國留學生們的要求下才啟動的情況下，清公使的消息來源最有可能還是由留學生們所提供之訊息管道在〈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二次報告〉針對抗議事件的來龍去脈的報告中得知：

日本理學博士坪井正五郎著《最近野蠻人類寫真》，詳繪其惡醜風俗如支那、朝鮮、北海道土人、臺灣生蕃、琉球、安南、印度、及他南洋群島土人。日人將據其圖冊傭聘各異人類，開館于博覽會門前。留學生聞之，怒髮上指，痛日人辱我已甚，不齒吾國于優等人類也。發書各商埠董事及內地，詳將各種情形刻圖著說，以勸內地同胞及來臨博覽會諸遊歷者。⁶⁰

此段說明非常清楚地顯示出，留學生們是如何主觀地推斷認定人類館的展出內容和目的。在上一節的分析中，我已指出留學生們如何在翻

月底到達大阪人類館布置場內陳列品的松村瞭(坪井正五郎的助手)，在其對此次展出的觀察檢討報告中的結論，也是強調場地空間有限、設備不足及準備時間倉促等因素，是造成此次展出遭受批評的主因。見松村瞭，〈大阪の人類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8：205(1903)，頁289-292。他們均未提到有關支那人展出的原始規劃，也並不認為以真人展示各人種風俗的方式有何不妥。

60 〈博覽會事件〉，頁15-16。

譯《國民新聞》有關人類館的報導中，擅自添加了有關坪井的著作之陳述。在此處的留學生會館的回顧說明中，坪井正五郎所著的《世界風俗寫真帖》則直接被留學生們曲解為《最近野蠻人類寫真》。⁶¹在留學生們的界定下，這一本著作乃是針對各類野蠻人「詳繪其惡醜風俗」；而且留學生們也斷定這一本著作，正是人類館展示的規劃藍圖（日人將據其圖冊備聘各異人類，開館于博覽會門前）。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明瞭，從一開始，留學生們就以其對於坪井正五郎著作的「野蠻化」解讀——《世界風俗寫真帖》就是《最近野蠻人類寫真》——作為他們對人類館性質認知定位和發動抗議的基礎。然而，他們如此的詮釋，特別是對《世界風俗寫真帖》的理解，是合理的解讀認知嗎？坪井的《世界風俗寫真帖》的主旨，果真如留學生們所指控，是針對野蠻人的惡醜風俗而完成的著作嗎？而這本書也真的就會是人類館展出的設計藍圖嗎（尤其是關於支那人的一部分）？這些疑問都有待進一步的分析和檢討。

誠如我在先前的分析中所指出，在《世界風俗寫真帖》這本大約一百頁左右的半通俗讀物中，是以中學教育水準為主的讀者為對象，介紹鄰近日本內地人種的其他人種的生活風俗習慣，書中大約有十餘頁的篇幅分為五部分是有關支那人風俗的描述和圖片說明，其中兩部分正是纏足和鴉片吸食。以這樣的內容比重分配，乍看之下，身為編著者之一的坪井正五郎，的確似乎有意要以這兩種行為風俗當成「支那人」風俗的主要特色；況且坪井在介紹纏足時，又確實以「奇習」和「蠻風」的字眼加以形容，並附以「小腳 X 光片」和赤裸小腳的相片圖解。另外，在說明支那人流行吸食鴉片的部分，說明文之後也附

⁶¹ 當然，坪井正五郎的所有著作中，完全沒有以「最近野蠻人類寫真」為標題的作品。

加了一幅模樣非常恐怖的遭受煙害的人圖片。如果從這些書中所呈描述和圖片，再加上留學生們一開始就認定這本著作，即是坪井正五郎為人類館展出的規劃藍圖的思考前提的因素看來，清國公使向日本外務省的抗議似乎也言之成理。可是，坪井正五郎對於人類館展出的規劃，真的是要依照這本著作嗎？除了上述《國民新聞》的中譯本，所自行添加上的文字(悉照坪井博士調查世界風俗寫真帖辦法云云)外，並沒有任何其他日文資料有這樣的報導。再者，即使坪井正五郎的確參考或完全依據此書作為人類館展出的藍圖，他真的是要以纏足和鴉片吸食作為代表，以便再現支那人是野蠻人嗎？由於原先預定的展出被中止了，我們很難有確切的依據，或是代替坪井正五郎來回答這個問題。然而《世界風俗寫真帖》中，對於如何看待纏足的說明，卻提供了我們重新思索這一個問題的解答的重要線索。

在坪井正五郎介紹纏足的習俗的書面說明中，他開宗明義以「西洋婦女的束腰和支那婦人的纏足，是開明諸國的風俗中，讓人最感到奇異的東西，這兩者可說是東西相對的『一對寶』(好一對)」的簡明陳述，來界定纏足在中國的文化意義。⁶²的確，在後續的評論說明中，坪井正五郎如同當時中國的反纏足和天足運動者一般，以「奇習」、「蠻風」等字眼，將纏足行為本身視為是野蠻的行為；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行文中，坪井是以「開明諸國的風俗」來界定纏足在中國的地位，而且是和西洋的束腰行為作對比。簡言之，坪井在此並無意要以纏足來代表(symbolize)中國所有的風俗，並且因而界定支那人是野蠻人——這是人類館抗議風波中，中國方面的批評所一口咬定的

62 原文為：「西洋婦人の腹を細くすると、支那婦人の纏足とは、開明諸國の風俗中、最奇異に感ぜらるるものにして、東西相対して好一對をなすものなり。」見坪井正五郎、沼田賴輔編，〈支那婦人の纏足〉，《世界風俗寫真帖》，第28節。

坪井的真正用意和思維邏輯。相反地，我們從坪井上述的引言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當坪井在評述纏足是蠻風時，他是以中國屬於「開明諸國」的前提，來探討為何中國(作為一個開明的國家)會保有此奇異的習俗(正如同開明的西洋諸國，為何會有束腰的野蠻習俗，也是令人感到好奇不解)。簡言之，纏足和束腰兩種行為，從坪井的角度看來，正因為它們都是殘留在文明社會中的野蠻行為，才會如此引人(尤其是人類學者)的好奇。

姑且不論坪井對這兩項習俗的評論，是否帶有現代人的偏見的問題；重點是，當坪井如此呈現纏足的文化意義時，其對於纏足所存在的當時中國社會，是以「開明諸國」標準來加以界定的。如果我們單從他形容纏足為蠻風或奇習的說法，或是圖解說明中令人不忍卒睹的「小腳 X 光片」和赤裸小腳，來評斷和推演坪井對於纏足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以及纏足行為和當時的中國社會與整體中國人的關係，或許會如同中國留學生們一般，將坪井視為是要藉由這個「蠻風惡習」來醜化所有支那人陰謀者，但是這種對於坪井思維的理解，基本上是斷章取義的作法，並沒有仔細閱讀坪井對纏足風俗存於中國的文化意義。再者，即使無論《世界風俗寫真帖》的內容如何，留學生們斷定人類館的展出計畫必定是以這本著作作為藍圖的想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事實上，在 1902 年 11 月出版的由坪井正五郎所主持校閱的《人種地圖》所附錄的《人種誌》中，有關「支那人」(Chinese)部分的各項說明中(體質、語言、人口分布等)，編者簡短地介紹支那人的一些歷史和生活特徵，完全沒有提到纏足和鴉片。⁶³

由於人類館關於支那人展出的部分，是一個沒有真正再現的「他者再現」，而且它所公布的原始計畫並沒有任何細節，足以說明它真

⁶³ 烏居龍藏編輯，坪井正五郎校閱，《人種誌》(東京：嵩山房，1903)，頁 26-27。

正展時可能的樣貌。任何推論揣測，包括留學生們當初的指控，都無法得到確實文獻證據的證實。但是從我們以上關於《世界風俗寫真帖》(1901 年出版)和《人種誌》(1902 年出版)中，坪井正五郎有關支那人論述的分析討論，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蛛絲馬跡，來推測 1903 年由坪井正五郎規劃的人類館，或許應該不會是從負面的角度，尤其是所謂蓄意將支那人野蠻化的立場，來展現支那人的生活風俗。再者，除了上述著作中坪井有關支那人和支那文明的一些看法外，坪井的一些基本價值觀也應列入考慮。坪井本人一直認為所謂人種之間的區別均出於人為，並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而且所謂人種之間的差異也並非是不可跨越的鴻溝。⁶⁴就此思想特色而言，我們不應該將坪井正五郎和強調特定種族具有天生優越性的種族主義者混為一談。所以，就以上所述的坪井有關支那文明的看法和他的一些基本價值看來，認為坪井規劃的人類館中支那人的展出，是基於要蓄意侮辱支那人的動機和目的之看法，它的可信度是相當令人質疑。

然而，即使坪井正五郎並未懷有惡意，單就其想要以活人演出，來展現他者的作法而言，是否也顯示出一種知識上的優越意識，或者說是一種知識暴力行為的展現呢？事實上，松田京子的看法就是從上述角度出發，她認為坪井正五郎的人類學，可謂是「日本的東方主義」(Japanese Orientalism)的一種形式。她指出在坪井視日本民族為混合種族的思想架構下，坪井強調日本國內的先進種族者(日本種族 / 日本內地人)具有對其他落後的種族(琉球人、愛奴人等)教導的責任，也才能因此增進全體國民全體的幸福。而為了要完成此項教導的責任 / 使命，必須對於落後的「他者」的特性，要有完整清楚的知識基礎，而這正是人類

⁶⁴ 參閱與那霸潤，〈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人種」観念の変容——坪井正五郎の「人類学」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民族學研究》，68：1(東京，2003.6)，頁 85-97。

學的重要性之所在。也因為如此，松田京子從此角度強調坪井的人類學和日本帝國擴張的密切關連性。同時她認為人類館的展出動機，即是基於這種為了掌握對於他者完整認知的價值觀上；而實際設計的參考榜樣，即是源自於坪井本人在 1889 年留學歐洲期間，參觀巴黎博覽會所見的「野蠻未開人種之村落」。⁶⁵

松田京子的論點中，關於人類館和「野蠻未開人種之村落」的歷史淵源的看法，仍有值得檢討之處。因為人類館活人展出形式的設計靈感，或許的確源於歐美博覽會的先例；但是其展示的人種內容，是否就也是以「野蠻未開人種」為限，則是詮釋判斷上的問題。畢竟人類館意趣書中所公布要展示的人種是「離內地最近的異種人(内地に最近の異種人)」——「異種人」是否可以理解等同為「野蠻未開人種」是有待商榷的。因為「異種人」的確可能包含所謂野蠻未開之人種，但也可能同時包含所謂文明已開人種，甚或是所謂半開者。換言之，在歐美博覽會上，對於殖民地土著的再現過程，所呈現的明顯兩極對比的「文明者(歐美的觀眾)vs.野蠻者(殖民地土著)」的文化意義，是否能夠一成不變地拿來套用解釋人類館的「日本內地人 vs. 最近的異種人」的真正意涵，恐怕還是有相當大的辯論空間。

另一方面，日本當代學者坂野徹則從觀察坪井本人的學術活動的多元活潑面向(包含考古、各地風俗、人種議題等)和他對各類事物的高度好奇心的角度，認為坪井的學術研究充滿濃厚的「好事家」精神，可謂對於新鮮事物的探索理解，一直抱有一種「知識玩家」態度。從坂野徹的研究角度看來，人類館真人展出的設計，將各類人種集於一堂，並有舞臺表演載歌載舞的熱鬧景象，再加上各民族的文物陳列，可說一方面標榜學術，一方面達到場外餘興的效果，而這應該也是反映其

⁶⁵ 松田京子，《帝國の視線——博覽会と異文化表象》，頁 157-160、138-139。

好事家精神的一種實踐。⁶⁶換言之，坪井的人類館可謂是其想以趣味性「異國風情館」的真人生動表演方式，向大眾「推銷」介紹人類學研究成果的產物。

本文無意在上述兩種對於坪井的學問性質的詮釋上作優劣判斷。但是坂野所提到的坪井正五郎的學術可能面向，以及我們先前言及其對支那文明和人種的一些看法，或許都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討中國留學生們對於人類館的種種指控的正當性。長久以來，無論大阪人類館是否如外界所指控，真的計畫要展出「纏足女／鴉片男所代表的野蠻支那人」(事實上，也從未展出過)，日本政府，或者說人類館主腦坪井正五郎，卻在公共記憶中，尤其是中國方面的公共記憶中，一直扮演著曾經企圖實踐此種羞辱中國人計畫的陰謀家角色。雖然根據本文的分析，這樣的歷史記憶形成的事實基礎是值得商榷的。由於先前有關人類館事件中有關支那人展出部分的研究，除了坂元ひろ子的研究外，大都未嚴格審視留學生們的控訴和中國媒體的反應，所以上述這些有關坪井正五郎學術立場的資訊，有助於我們問題化(problematize)指控者的論述，分析反省這些論述中有多少程度可能是言之成理的控訴，而又有多少程度可能是他們主觀情緒投射的產物。換言之，長久以來被指控者所詮釋的「纏足女／鴉片男所代表的野蠻支那人」，所佔據日本大阪人類館中「消失的支那人」所遺留下來的詮釋上的空白，應當重新還原其空白的詮釋空間。相對地，所謂「纏足女／鴉片男所代表的野蠻支那人」的論述和想像，則應回到其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的脈絡上，才能顯現其真正的歷史文化意義。

⁶⁶ 坂野徹，〈好事家の政治学——坪井正五郎と明治期人類学の軌跡〉，《思想》，907(臺北，2000.1)，頁163-184。

四、歷史、認同與記憶——近代中國的「野蠻情結」與國族認同

西元 1878 年 3 月 5 日(光緒四年二月二日)，大清帝國首任駐英欽差大臣郭嵩燾在其日記上記載了一段後來經常被引述的評論：

近年波斯國主遊歷倫敦，君主亦贈以寶星。《代謨斯》新報頗訾之曰：「哈甫色維來意斯里[得]，何足以當寶星也？」蓋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國曰色維來意斯得，歐洲諸國皆名之。其餘中國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哈甫者，譯言得半也，意謂一半有教化，一半無之。其名阿非利加諸回國曰巴爾比里安，猶中國夷狄之稱也，西洋謂之無教化。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減，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⁶⁷

郭嵩燾所擔憂者——當時多數中國知識菁英，尚未意識到此種可謂「華夷異位」的新世界觀的形成，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已不復存在；但是他對中國在此新世界秩序下的模糊定位(是野蠻人的國度？還是僅次歐洲文明國的國度？)，卻可謂是日後許許多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此新世界秩序時，在自我定位和自我認知上呈現錯亂矛盾現象的縮影。

如眾所知，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尤其是甲午戰爭後，西方各國作為所謂「文明國」的典範，已是中國知識界的共識。在晚清各類的公共論述報章雜誌上，作為歐美強國的代名詞的「文明國」字眼，幾乎

⁶⁷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 3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 439。

可謂觸目所及無所不在。但是中國的位置呢？雖然以所謂「半開」或「半文半野」的字眼，亦即郭嵩燾所謂的「哈甫色維來意斯得」，來定位中國和中國人的說法時有所聞，但是在一些較激烈的論述中，以「老大帝國」、「病夫」、甚至「野蠻賤種」字眼，形容中國和中國人的說法卻是司空見慣的手法，從而強化危機意識和改革的迫切性。例如著名的晚清思想家唐才常，即以「文明人終將消滅野蠻人」的法則，論述當時的國際關係。在其〈萬國史記〉一文中，充斥著「文明 vs. 野蠻」的論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論及當時中國人何以招致外人「野蠻土番我」（以對待野蠻土番的方式加諸中國人）的原因時，特別引用張之洞〈不纏足會敘〉中，談及四萬萬人中，有二萬萬女子纏足，一萬萬男子吸鴉片煙，其餘幾乎是八股無用書生，以至於「家家為病夫，人人為侏儒」的說法，來強化「時文、纏足、洋煙」使中國人淪於野蠻而終將滅種的危機意識。⁶⁸換言之，野蠻人不僅是指人種位階上的最低階的位置，更代表了即將面臨被文明人消滅的不可避免之命運。

同樣地，當康有為在論述反纏足的正當性時，也是將纏足（還有鴉片吸食等現象）和所謂「野蠻」相連結：

方今萬國交通，政俗互校，稍有失敗，輒生譏輕，非復一統閉關之時矣。吾中國蓬華比戶，藍縷相望，加復鴉片熏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為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⁶⁹

康有為上此奏摺時為西元 1898 年（光緒廿四年），恰好是上述郭嵩燾對於中國的定位有新見解的二十年後。姑且不論郭嵩燾有關中國屬於「半

⁶⁸ 唐才常，〈萬國史記〉，收入氏著，《覺顛冥齋內言》（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 3，頁 140-142。

⁶⁹ 出自康有為，〈請禁婦女纏足摺〉，收入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上冊，頁 335。

開」的可能性的論述，關於外國人視中國為野蠻的說法，康有為、唐才常和郭嵩燾三人的看法可謂前後一致。但是，在郭嵩燾日記中所謂的「無教化」的野蠻狀態，在康有為和唐才常的論述中，卻是相當明確且具體的現象：對康有為而言，是破舊的房舍、鴉片吸食盛行、乞丐滿街、婦女纏足；對唐才常而言，是八股書生，吸食鴉片者和纏足女子。而這些「野蠻」現象，也讓他深深引以為戒和為恥。

郭嵩燾、唐才常和康有為關於中國的新定位，以及中國人的「野蠻」現象的看法，提供我們一個重要視角來檢視本文所探討的 1903 年大阪人類館事件。誠如我先前的分析中所指出，從整個事件的一開始，以清國留學生會館成員為主所策動的抗議論述，無論是針對人類館的展出目的或是展出內容的指控，大都是立基於他們主觀的詮釋和臆測，而非是根據當時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訊息。當時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尚處於不得不接受以歐洲文明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並從中尋找自我定位且時時感到迷惘和焦慮不安的心態之情況下，1903 年 2 月 10 日左右所出現的有關人類館展出的新聞報導，意外地觸動了近代中國國族自我認同的敏感神經。

首先，留學生們和中國輿論認為人類館的展出設計——在沒有任何其他「文明人」也在場的情況下，將支那人和其他所謂劣等野蠻人同臺展示——即是日本人(或是坪井正五郎)蓄意貶低中國人為野蠻人的計謀。這樣的認知一方面反映了坂元ひろ子所指出的留學生們本身對於其他人種的歧視，也就是說在傳統中國天下觀的作用下，以華夏中國為中心而貶抑其他人種為「夷狄」的看法。但是更弔詭的是，另一方面，留學生們一口咬定此次人類館的展出，即是野蠻人展示的說法，也可以說是傳統中國天下觀中的「華夏 vs. 夷狄」的文明 / 野蠻二元對立思維，在面臨上述郭嵩燾所述的歐洲中心的世界觀衝擊下的產物。換言之，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承認歐洲人為文明人，又已經

無信心自認中國為處於文明國地位；因此在人類館展出內容中並沒有歐洲人種(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此舉亦即代表「文明人種」的位置是空白的)的情況下，留學生們在上述「不是文明，即是野蠻」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的作用下，將所有原先被人類館規劃要展示的人種(包含支那人)，全盤歸類在「野蠻人」的位置上。

其次，從唐才常有關人種關係的論述中，很清楚地表現出一種將「野蠻」和「滅亡」之間劃上等號的思維；而在晚清時期此種論述所導致的所謂「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更是充斥於各類論述。⁷⁰由此觀之，在人類館原先的計畫中，基於「最近異人種」的招募方便性理由，因而所挑選的七種人種齊聚於人類館的規劃，在留學生們在上述危機意識作祟下的解讀中，卻具有全然不同的深刻符號意涵。在留學生的〈嗚乎支那人！嗚乎支那人！〉一文中，他們對於人類館將支那人和其他的被殖民者／臣屬者(如印度人、朝鮮人)和野蠻人(愛奴人、臺灣生番等)並列展出計畫，所表達的憤怒感受和不安反應，不僅僅是出自於受到歧視的反感情緒；更是因為人類館如此的規劃，不啻是要將如唐才常所論述的中國人即將步上其他野蠻人滅亡命運的預言，以最直接的方式(活人演出展現)赤裸裸地公開在世人面前(即將滅亡的野蠻人大集合)，因而挑動了深藏於留學生們和其他中國知識分子內心的「亡國滅種」恐慌，令他們為此痛心疾首。

此外，在此事件爆發之前，改革派早已充斥各類將中國和中國人「野蠻化」的論述，例如上述康有為和唐才常將纏足和鴉片與野蠻連結的論述，因此這些將中國和中國人「野蠻化」的論述，尤其是將纏足和鴉片與野蠻連結的論述，對於晚清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包

⁷⁰ 參見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pp. 75-77, 107-115.

含留日學生團體，即使不是深植人心也可謂是耳熟能詳。所以當留學生們從坪井正五郎的《世界風俗寫真帖》(或是他們筆下所謂的《最近野蠻人類寫真》)，看到他們熟悉的有關鴉片和纏足的圖片和照片時，更強化了他們對此次展出的內容(纏足和吸食鴉片的野蠻習俗)和目的(公開將中國人以野蠻人之姿供世人嘲笑的計謀)的判定。他們再一次地投射了其主觀上認定會展出的內容和其所代表的意涵，從而界定人類館的展示內容，並據此發動中國方面的抗議和指控。

誠如上一節的分析所指出，此歷史事件不論是就展出內容或展出目的而言，日本主辦單位方面(亦即被指控者)留下了許多空白，而這些空白幾乎都被以中國留學生們(亦即指控方)的論述主導佔據的局面。這些由指控者所陳述的有關人類館的「事實」主導了日後，尤其是中國方面，關於人類館的相關報導和歷史記憶。例如在人類館事件發生不久後，一篇充滿悲痛激情的文章〈勸同鄉父老遣子弟航洋遊學書〉，以「今日吾國滅亡之風潮，誠達於極頂」為論述前提，列舉歐美白人、俄國人、日本人都宣稱要「奴滅」中國。在談到日本人的部分，作者特別加註說明「今年日本人博覽會將列我支那於臺灣生番等之亡種中」。⁷¹同樣地，在同一時間發表於《外交報》的一篇文章，在稱揚留學生有利於外交時，即以留學生大力抗議「日本大阪博覽會附設人類館，將置吾國人之吸鴉片纏足者於野蠻之列」為事實例證，說明因為有留學生的努力維護國體，才讓日本取消此項展出計畫。⁷²另外，刊行於《江蘇》第1期的一篇有關大阪博覽會的報導中，在提及人類館事件時，也是以「日本初議人類館中設中國人二：一小足女子，一

71 〈勸同鄉父老遣子弟航洋遊學書〉，《游學譯編》，6(長沙，190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頁0627。

72 〈論選派游學有裨外交〉，《外交報》(上海)，40(1903年4月12日)，頁271。

吸鴉片者，留學生力爭得撤去」的陳述加以註解。⁷³

對於反纏足運動者而言，由上述論說方式所定位的大阪人類館事件，更是一項有力的「歷史教訓」，適足以證明纏足具有「野蠻性質」和「國恥」的雙重意涵，證明了反纏足運動的正當性和迫切性。類似這樣的論述，可謂挪用(appropriate)人類館事件以支持反纏足運動的論說，不僅出現在前述 1903 年 3 月 10 日和 20 日的《大公報》的〈論說〉中，即使在人類館事件已成為歷史事件之後的一兩年後，仍然出現在反纏足的宣傳上。例如在 1904 年底的一篇祝賀上海〈天足會〉大會的文宣，在論述纏足之習有四大害(害及人種、多難產、不便操作、大貽國恥)時，即有下列的陳述：

女子纏足為全世界所無之醜態，我國作俑之人，窮形極想，欲以女子為玩物，而狠然下此毒手，以殘害我女同胞，致使各國傳為笑柄。如去年日本博覽會中，以中國小腳女子當爐，又以小腳女子列入人類館。今年美國博覽會又以中國小腳鞋列入陳設，於各國眾目昭彰之地，而顯此奇醜，實堪髮指。⁷⁴

同樣地，在 1905 年底刊行於《萬國公報》另一篇有關天足會的論說中，也提到了人類館的歷史經驗：

或談非洲有壓首之俗，黑蠻有鏤皮之奇聞者，莫不嗤其愚，而惡其忍，殊不知吾之纏足，外人正與非黑之俗一例觀也，或尤甚焉！猶憶前年，某國之開博覽會也，以我國纏足女與環球奇形怪狀之野蠻，同列一院，縱人觀賞，見者無不詬病。⁷⁵

⁷³ 〈日本大阪博覽會中中國福建品移出臺灣館始末記〉，《江蘇》，1(江蘇，1903.4.27)，頁 147。

⁷⁴ 〈恭祝天足會〉，《警鐘日報》(上海)，1905 年 1 月 18 日，收入於《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下冊(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頁 884。

⁷⁵ 〈廈門天足會約章敘論〉，《萬國公報》，1905 年 11 月號(上海)，頁 23781。

這些出現在人類館風波過後一兩年之後的論述，不僅重覆纏足是野蠻習俗，和招致外人恥笑的「國恥」；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行文表述，都將人類館展出中國纏足女子的現象，當作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實。如果讀者並不清楚 1903 年大阪人類館事件的來龍去脈，勢必會認為當時的確發生過有纏足女子，被當作野蠻人以供世人觀賞恥笑的事件。換言之，原先由 1903 年留學生們所主觀認定的人類館景象，在經由這些報導所型塑的歷史記憶中，已轉換成為確實發生過的歷史事實。這樣的現象在三四十年之後，在馮自由所著的《革命逸史》的〈大阪博覽會侮辱中國事件〉一文亦復如此：

同時該博覽會中特設人類學館，內置一二中國人，表演我國腐敗舊俗，以代表我國民全體，而與各地野蠻人種並列，亦為留學生所見，群起提出抗議。駐神戶領事蔡勛因此親赴大阪向當地官吏交涉，要求取消此種侮辱國體之陳列，日人初亦互相推諉，久未解決，留學生會館乃公函致貝子載振及預備派往觀會各官商，謂日人以無理辱我，止其勿來。日本政府聞之，懼因此傷害兩國感情，卒令大阪府撤去之。是年夏間，余自粵返日，亦作大阪之遊，已不復見該博覽會有此種陳列。⁷⁶

在此段有關人類館事件的歷史回顧中，馮自由雖未言明「腐敗舊俗」為何，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博覽會中臺灣館的陳列時，馮自由有「館中陳設如小足婦人，吸鴉片烟等種種陋俗，均侮辱吾國國體特甚」之語。⁷⁷所以，或許他所謂的「腐敗舊俗」即是纏足和鴉片吸食。但是

⁷⁶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190。

⁷⁷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 189。事實上，臺灣館實際上並未有這些吸食鴉片和纏足女的展示，馮自由的描述並不精確。日本政府原先的規劃的確有這些行為和風俗的照片展出和介紹，但是後來臺灣總督府覺得它們有損統治政績形象，因此下令不得展出。見呂紹理，《展示臺灣》(臺北：

更重要的是，他所描繪的「內置一二中國人，……而與各地野蠻人種並列，亦為留學生所見，群起提出抗議」的情況，則不啻是將所謂「野蠻中國人展出」，當作是已發生過的事實，只是因為留學生們的抗議，日本政府才在中途將此展出撤銷。他在文末中以自己作目擊證人的方式(已不復見該博覽會有此種陳列)，更是強化了此種錯誤的歷史記憶。

從上述歷史例證和其分析討論，我們不難發現，由留學生們所主導定位大阪人類館有關「支那人」展出計畫的內容和目的之指控，在近代中國的思想論述和公共歷史記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僅扮演了型塑留學生們「維護國體，對抗外侮」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成為強化反纏足等文化社會運動正當性的重要「歷史殷鑑」。另一方面，它所定位的人類館展出的動機——日本人企圖醜化其他亞洲人種以凸顯日本人種——則又相當符合當代日本學界(如前述松田京子、吉見俊哉等)流行以「日本的東方主義」的解釋框架的需求，將人類館事件解釋為近代日本帝國知識發展和帝國勢力之間的相輔相成關係的典型案例。簡言之，長久以來，中國留學生們關於人類館的指控和界定，一方面扮演了近代中國國族主義的公共記憶的要角；另一方面則和第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學界研究批判日本帝國時期殖民霸權的基調相契合。在這兩種因素的作用下，它幾乎成為定位人類館展出內容和目的的定論。

但是，正如本文的分析所指出，留學生們關於人類館內容和目的各種指控和論斷，在最好的情況下，可能是接近原先事實的揣測；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可謂是無的放矢地扭曲中傷。長久以來由指控者所詮釋建構的「事實」，佔據日本大阪人類館中「消失的支那人」所遺留下來的歷史空白，應當重新被釋放出來，以便讓種種其他可能的詮釋顯示人類館事件的多元複雜面向。更重要地，以留學生們為代表的

麥田出版社，2005），頁 135。

中國對於人類館的種種論述和建構想像，必須回到它們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的脈絡上，才能顯現其真正的歷史文化意義。從此研究角度而言，留學生們和中國關於人類館的種種論述和猜疑推測，無論是言之鑿鑿的「野蠻人大展」的論斷，或是纏足女和鴉片男為野蠻中國人代表的推測，甚或是看似荒誕不經的滿洲人是野蠻中國人代表的臆測，都可謂是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野蠻情結作祟下的產物。當然，也唯有在重新釐清這些論述和建構想像的歷史意涵的情況下，長期以來立基於它們之上的公共歷史記憶，才能得以擺脫原先化約且單面向的歷史認知，從而展現具有更複雜多元面向的豐富內涵和更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識。

(本文於 2009 年 10 月 5 日收稿；2010 年 4 月 6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劃(96-2411-H-004-009-MY3)之成果。在本文撰寫期間，關於文獻資料的蒐集和解讀工作，承蒙日本立命館大學的唐澤靖彥教授、大阪府立桃谷高等學校二宮一郎先生、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林果顯教授，以及岩口敬子小姐和清水裕美子小姐的多方協助，謹在此向他們表達我誠摯的謝意。尤其是二宮一郎先生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慷慨地允許我分享他所整理的日本外務省文獻資料，謹再次向他表達謝意和敬意。此外，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了若干相當寶貴的修改意見，也謹在此向他們致上深深的謝意。

The “Barbarian Complex”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1903 Osaka “World’s Natives Building”

Jui-sung Y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n the eve of the fifth Industrial Exhibition held in Osaka in 1903, a news report revealed the plans for the “World’s Natives Building,” which was a brainchild of the anthropology professor Tsuboi Shogoro of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news report, the building would hold a living exhibition of representatives of seven human races, including Taiwanese aborigines and the Chinese race. This news infuriated many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who saw the exhibit as a conspiracy by the Japanese to portray the Chinese people as barbarians, especially by showing women with bound feet and opium smokers as typical “barbarian Chinese.” Although the Chinese part of the show was cancelled before its opening due to the protests by both Chinese students and Qing diplomats, the incident had already triggered many reactions from the Chinese news media. It thus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Most studies of this incident have uncritically treated the Chinese accusations of the “World’s Natives Building” exhibit as reasonable and objective statements. They

have failed to notice that these accusations were in fact products of the students' subjective and strong emotions. This study carefully examines document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hinese students' discourse in depth and trace back the possible sources for their construc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exhibit's content and purpose. For example, I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students built up their accusation regarding footbinding and opium smoking in light of their twisted interpretation of Tsuboi's work *Ethnographic Album of the World*. This important fact has never been noticed and critically investigated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on this issue. Moreover, after clarifying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discourse, I have embedded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sense of crisis, investigat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discourses and the "barbarian complex"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nsciousness. I illustrate that the accusation that Tsuboi planned the exhibit to feature women with bound feet and opium smokers, thus representing the Chinese as "barbarian" was mostly a straw man. The complexity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ents' accusations can only be explicated clearly when they are firmly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Chinese "barbarian complex."

Keywords: barbarian, "World's Natives Building," Tsuboi Shogoro, foot-binding, opium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 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99 年 8 月 9 日

計畫編號	NSC 96-2411-H-004-009-MY3		
計畫名稱	身體、權力與認同：中國文化中「身體」的實際與虛構-近代中國的「文明化歷程」：「野蠻/病態」身體論述與近代中國國族想像		
出國人員姓名	楊瑞松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	2010 年 6 月 18 日至 2010 年 6 月 26 日	出國地點	日本東京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此行主要目的為赴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尋找資料。國會圖書館的數位資料庫已將大量十九世紀以來的古籍數位化，非常便利一般讀者使用閱讀。但館內的檢索系統更是方便研究需求，因為以關鍵字搜尋的結果，不僅會出現有關該關鍵字的書名，而且論文集部分有包含此關鍵字的論文也會顯示。如此一來，許多在國內未能以圖書館檢索系統查獲的中英日文圖書資料，均可以借由國會圖書館的系統顯現，對於研究者的視野有莫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國會圖書館對於影印的版權限制卻有令人感到不便之處。凡需要影印的資料，均需填單申請由館方人員代為影印。此規定除了造成影印費用較高外，並且嚴格控管影印之頁數。其中令人較不解的是，凡是論文集所收之論文，依規定不可以全文影印，最多僅能影印其全文的一半以保護作者的版權。此項規定在台灣前所未聞，雖多次和館方人員溝

通，依然無法影印全文，造成資料取得上諸多不便之處，為此行美中不足之處。

二、研究成果

此行適逢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唐澤靖彥教授來東京從事短期研究。唐澤教授為多年好友，也由於他的幫忙，得以和日本國會圖書館館方人員有良好的溝通，取得多項重要資料，除了對於本研究計畫(關於近代中國的野蠻/病態論述和國族想像)多所裨益外，也對於我近年來關於國族論述想像課題的相關資料大有助益。例如關於英日文的黃禍論述，即在此行中又尋得多項重要資料。再次感謝國科會的贊助，使得此計畫得以順利進行，獲得豐富的成果。

三、建議

四、其他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已發表之論文：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 21, 2: 頁 107-163)對於此事件的歷史意義提出新見解，並且對於長期以來，尤其是日本學界關於此事件的詮釋，提出不同的看法，對於日後針對此議題的研究，開拓了新的研究視角。

